

裁军谈判会议

CD/PV.262
26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百六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4月26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胡利奥·C. 卡拉萨莱斯先生

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罗伯托·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澳大利亚

R. 布特勒先生

R. A. 劳先生

J. 库尔特尼女士

比利时

M. 德帕斯先生

巴西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特拉洛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C.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佩登丁

吴丹吞

加拿大

J. 艾伦·比斯利先生

杰勒德·R. 斯金纳先生

R. J. 罗尚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梁德凤先生

林 成先生

杨明良先生

古 巴

卡洛斯·莱丘加·埃维亚先生

佩德罗·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维沃达先生

A. 齐马先生

埃 及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I. 阿里·哈桑先生

W. 巴西姆女士

A. 马赫尔·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F. 德拉戈尔斯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H.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F. 埃尔伯先生

M. 格德茨先生

W — E.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F. 加伊达先生

T. 托特先生

印度

M. 杜贝先生

S. K.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拉尔托·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普鲁伊斯廷·拉马丹女士

安德拉贾蒂先生

拉齐亚蒂·坦齐尔女士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谢霍莱斯拉姆先生

N. K. 卡米亚布先生

F. S. 锡尔詹尼先生

J.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菲先生

莫塔莱比先生

卡拉米先生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B. 卡布拉斯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G. A. 布拉切西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博士
小西正树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萨达琳达·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巴勃罗·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 古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A. 斯卡利先生
M. 什赖比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荷 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R. 扬·阿克爾曼先生

尼日利亚

J. O. 奥博赫先生
L. O. 阿金德勒先生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塞萨尔·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G.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T.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P. 巴洛伊乌先生

A. 克雷图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H. M. G.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E. 博妮尔夫人

H. 伯格伦德先生

J. 隆丁先生

L. E. 温伦先生

A. M. 劳夫人

J. 普拉维茨博士

苏维埃社会主义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共和国联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P.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T. F.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V. F. 普里亚欣先生
G. A. 安齐费罗夫先生
Y. V. 科斯坚科先生

联合王国

L. J. 米德尔顿先生
D. A.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L. G. 菲尔兹先生
N. 克莱因先生
N. 卡雷拉先生
R. 霍恩先生
R. 诺曼先生
P. S. 科登先生
C. 皮尔西先生
J. 帕克特先生
K. 克里顿伯格女士
B. 默里女士

委内瑞拉

奥斯卡·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E. 埃萨基·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兼联合国秘书长

个人代表

R.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斯里兰卡)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侯赛因·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他今天将作为第一个发言者向会议讲话。我祝愿他访问日内瓦获得成功。

大家都记得，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我们一致同意今天举行一次谈判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以处理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登记在今天发言的代表发言完毕之后，我准备让全体会议休会，并召集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议下述问题：

- (1) 由一个非成员国提出的参加会议全体会议的请求。
- (2) 为审议关于议程项目 1、2、3 和 5 的提案而设立的接触小组所进行协商的结果。
- (3) 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主席致我的信。

这次非正式会议之后，我们将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也许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还将为会议及其各附属机构在 6 月 12 日至 15 日的一周内将举行的各次会议通过一个时间表。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伊朗、蒙古、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以及匈牙利的代表。现在请伊朗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侯赛因·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阁下发言。

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伊朗）：主席先生，我能有机会向一个肩负着非常重要任务的国际会议的各成员国代表讲话，是我很大的荣誉。

对于裁军问题及其在巩固和平及确保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了解得很清楚。在目前情况下，鉴于世界的国际局势，坚决认真地处理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各项问题的必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如果对于崇高的人道主义和热爱和平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政治意愿，不可避免政治上被操纵的话——不幸这在国际讲坛上往往十分常见——那么国际社会托付给四十国代表的这项巨大而重要的使命就不能完成。

(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伊朗)

今天在我向你们讲话的这个时刻，离开这个裁军论坛的开创已经许多年了，而你们正处于即将获得第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的边缘。我指的是化学武器公约，如果该公约得以以理想的形式实现，将被认作是当前会议上的一个最重大的成就。

对于一个一直是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目标和受害者的国家的代表来说，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向你们表达他对加速拟定这项公约的必要性的想法，确实是值得高兴的。

我想，在联合国组织存在的整个历史上，伊朗是使用化学武器的唯一受害者。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已为国际权威人士进行的正式调查所证实。因此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采取更加认真而迅速的步骤来完成这项公约。

你们作为这个会议的成员都很清楚，安全理事会1984年3月26日第S/16433号文件反映了由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的专家所进行的实地调查报告。这报告明确地证实使用了为国际公约所禁止的化学武器和包括芥子气和神经毒剂在内的毒性气体。这个由瑞典国防研究所高级化学研究员古斯塔夫·安德尔森博士、马德里大学预防医学教授马努埃尔·多明格博士、澳大利亚国防部材料研究实验室主任科学家皮特·邓博士、瑞士国防部核生化防护司司长乌尔里希·伊莫贝尔斯特格上校以及代表秘书长的埃克巴勒·雷扎先生组成的代表团于1984年3月13日至19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和检查了受到化学武器伤害的人。他们也收集了用于这种武器的材料样品。除了检查在使用过的武器和弹药中残留的碎片以外，代表团还把这种物证拍摄了影片和照片。

许多遭到化学武器伤害的伊朗人被送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英国、瑞典、日本、奥地利、荷兰以及瑞士的医院进行治疗。这些医院里参加医治的医生已证实使用了化学物质；比利时的根特大学和德国、奥地利和瑞典的医院所提出的医疗报告可被用来证实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几个月后将在德黑兰举行一次医学讨论会，已邀请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所有医生和专家到伊朗去检查这惨无人道的罪行的受害者。我相信，这次讨论会的审议将是有益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也是关心的。

(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伊朗)

进行侵略的伊拉克政府用该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财富和资源换取某些大国的最先进武器，它因武器失效感到失望和恼怒，就不顾一切地犯下了这些野蛮的罪行。

这场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就在各种国际讲坛上宣布伊拉克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并在1983年11月3日正式通知联合国，伊拉克正在使用这种武器。这一点在第S/16128号文件中有反映，该文件当时曾在成员国中散发。此外在联合国专家提出报告之前一个半月的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在对这个会议的发言中向国际社会通报了伊拉克的这种野蛮行为。但是结果如何呢？国际社会除了沉默和冷漠之外无任何别的表示；这种反应使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伊拉克政府继续进行其伤害了人类荣誉和尊严的犯罪活动。遗憾的是，甚至连不结盟运动也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姿态。难道不结盟运动不再遵守1970年卢萨卡最高级会议的最后文件了吗？这个文件是明确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又为什么如此镇静地保持沉默呢？

正如已简短地提到，并如本会议尊敬的成员们都清楚知道的，国际上已有不使用化学武器的承诺和所承担的义务。但对新公约应考虑的基本事实是，应以对付任何违反者的防御性的和强制性的措施促进这种承诺的实施。应当提出有效的国际措施和集体行动，以在出现这种违反行为时惩罚违反者。否则这项新公约仍会遭到和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同样的命运，而安全理事会按照新公约对现场视察报告的处理方法也会如同它处理秘书长派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专家小组的报告一样。

1972年禁止细菌及毒素武器的研制、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不但是不全面的，而且忽略了如核查制度这类问题的重要方面。

可以从联合国专家的报告中看出，特别是可以从第7页最后一段看出，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帮助了伊拉克生产化学炸弹；伊拉克连制造这项报告中所描述的包装箱的技术能力都没有。向伊拉克提供这种武器的那些国家即使不比伊拉克对人类社会负更大的责任，也应当负同等的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本会议肩负责任的成员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敦促联合国秘书长进行调查以确定哪些国家参与了向伊拉克提供这种武器。

(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伊朗)

如我们已反复提到的那样，在重要的国际公约中忽略了针对违约行为的严肃措施就会鼓励违约者继续其违约行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过去三年丧失了许多许多无辜的和毫无防御能力的公民的生命，便是没有禁止对居住区进行攻击所付出的代价。我谨告诉你们，就在昨天，在皮朗沙赫尔市有我的17名亲爱的同胞在伊拉克政权的轰炸下牺牲了。这种忽略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纵恿违反者进行更多的犯罪活动和侵略行动。毫无疑问，这就是使伊拉克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主要因素之一。

尽管按照国际法我们可以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但是我们宣布，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们将不采取这种报复行动。但是你们知道，当联合国专家还在伊朗的时候，甚至已散发联合国关于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之后，和这项战争罪行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之后，伊拉克仍在使用致命的化学武器。

难道人类的良知能够容忍这种忽略的态度能够容忍各国不采取这方面的严肃措施吗？

主席先生，当我国人民成为广泛使用化学武器对象的时候难道你认为世界人民，尤其是我国同胞不应当作出这样的推论，就是说超级大国长时期进行没有结果的会谈和谈判和提出许许多多方案在事实上只是化学武器的主要生产者超级大国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并逃避他们使用化学武器的直接责任而提出的虚伪措施吗？难道超级大国特别是在本会议装出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热情不是鳄鱼的眼泪吗？

是否应该把某些国家的沉默及其拒绝一般地谴责使用化学武器解释为他们同意生产和广泛使用化学武器呢？难道还有比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更为重要的任何政治考虑吗？

某些想办法将使用化学武器和这场战争相联系的其它国家的态度也并不比我上边提到的那些国家的态度好多少。如果这两者之间这种不合逻辑的联系不是直接表明使用化学武器在某些情况下是许可的话，至少它是间接地暗示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提一下欧洲共同体的声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野蛮使用化学武器的受害

(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伊朗)

者从那时以来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现在一方面默默地谴责伊拉克，另一方面却将停止使用化学武器与结束这场战争的条件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对于继续进行合法的自卫战的理由有许多话要说，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场合。我们要问一下签署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各国，由于任何理由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能否为伊拉克所犯的战争罪行进行辩解吗？难道你们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同这样的政府进行谈判将意味着化学武器是有效的吗？如果这样承认，无疑将鼓励他们将来使用化学武器。

我们都看见了某些有代表团参加本会议的国家如何拒不实施联合国大会1982年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第37/98D号决议的。难道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这些国家对于通过现正由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拟订的公约的善意吗？没有进行连续的国际监督的核查制度是现有国际公约的重大缺陷，新的公约产生以后应予以取消。更重要的是，我们强烈呼吁，应保证将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及其要求的适当核查措施列入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并给以优先地位。不然的话，不执行，也不核查，只在纸上承担义务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核查为了使其有效，应该包括这种武器的研制、生产、储存、获得以及技术转让等所有不同的阶段，特别是对其使用。我们提议应该把使用化学武器作为一种战争罪行，犯此罪者应当受到国际上的惩罚。

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争辩说，为了迫使别的国家坐到谈判桌上来他们不得不建立其化学武器的武库。我们认为这是以更坏的东西来消除坏东西。这种论点就如另一方要求建立如欧洲无化学武器区一样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美国给化学武器的拨款到1987年约达70亿美元，在以后五年中还将拨出八十多亿美元，人们怎能相信他所说的有必要禁止化学武器是由衷之言呢？我们又怎么能接受在欧洲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在中东和远东却允许这种武器的生产、储存和使用呢？

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巨大差距已使国际会议的气氛变得非常阴沉而闷郁并正在抹去最后的一线希望之光。国际社会对于裁军谈判会议仍然抱有希望，希望它在承担托付给它的巨大责任的努力中能带来较积极的未来的事态发展。

当然国际社会将会热切地注视本会议的努力。

我希望本会议将加速进行审议以期对这项期望做出积极的反应。

(沙伊胡莱斯拉姆先生, 伊朗)

最后我愿对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感激; 我愿对联合国派往伊朗的专家小组及其各自的政府表示感谢, 并对谴责伊拉克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 以及那些支持秘书长的专家小组的报告的国家表示感谢。最后, 我还得对给伊朗的受害者提供医疗护理的那些国家表示感谢。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 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期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自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以“裁军谈判会议”的名称行使职能以来已有三个月了。在工作的这个阶段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会议在为诸如防止核战争、停止核军备竞赛、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以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等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议程项目, 寻求解决方案方面, 处于停滞状态。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 21 国集团为迅速开展真正的谈判, 以期在核裁军领域拟定适当的国际条约和协定而进行的建设性努力, 一如既往, 遭到了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的顽固抵制。

会议工作一开始, 社会主义各国就呼吁有效地安排本讲坛的工作, 强调其谈判机构的性质。它们再次对会议实际上未执行已托付给它的核裁军方面的任务而表示关切。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本着推动就核裁军这个紧迫问题开展谈判的真诚愿望, 提出了体现在 CD/434 号文件中的具体建议。谈判会议也很了解 21 国集团国家在此方面做出的建设性努力。

但是事情仍然处于僵局。我们认为, 所以引起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主要在于西方国家故意进行阻挠的立场, 这些国家的这种所作所为仍在继续, 这将使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变为学术讨论的场所。为此, 它们提出了一系列进行谈判的初步条件, 并企图给会议强加一种不能被接受的工作方法。社会主义各国认为, 这种做法是违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为裁军谈判会议所规定的权限的。另外, 这种做法也违背了这个机构本身的议事规则。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我们认为是西方国家的阻挠使裁军谈判会议陷于僵局的。人们要求谈判会议审议和决定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尤其是核裁军，这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从而实现各国人民的深切希望，他们渴望在地球上保持持久的和平。

必须明白地指出，由于西方国家代表缺乏在此机构中进行认真谈判的意愿，裁军谈判会议又一次未能解决为诸如核禁试、防止核战争、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些高度重要的议程项目设立具有适当权限的附属机构的问题。

最近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常会的公报强调指出“一些与消除核战争威胁和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结束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有关的问题在当今的政治对话中应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布达佩斯会议的参加者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赞成更迅速地开始实事求是地审议和解决诸如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从质量和数量上冻结核武器，禁止外空军事化，禁止在外空和从外空对地球使用武力，以及在全球规模上彻底禁止化学武器这样一些重要问题。

他们还确认，凡是他们联合或个别提出的关于这方面的所有提案和建议都仍然有效，他们并准备以积极的态度，认真研究其他国家提出的旨在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威胁、停止军备竞赛，进行裁军以及巩固国际安全的提案。

蒙古人民共和国完全支持华沙条约社会主义成员国在这次会议上的工作成果。我们认为这些成果再次清楚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旨在加强和平缓和、控制军备竞赛、进行裁军、以及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发展和平和合作关系的不可改变的外交政策的立场。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谈论一下设立关于议程项目 5 的附属工作机构的问题。

在 1982 和 1983 年的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其原则立场，即：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应当履行其职责，立即开始谈判，并应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具有适当权限的附属机构。根据这种立场，并为了实施联大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提案和具体草案，另一方面支持其它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提案和文件。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在1984年会议之初,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下述权限草案, 该草案载于CD/434文件中: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 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机构, 以便谈判缔结一项或在适当的情况下缔结若干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各个方面的军备竞赛的协议, 并考虑所有有关建议, 包括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及从外层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的建议。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第二期会议结束时就其工作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报告。”

这项权限草案完全符合第38/70号决议, 这是联合国大会第38届会议上, 对此关心的国家作出了积极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并取消了另外两项决议草案而通过的唯一有关的决议。表决结果表明, 第38/70号决议以147票的压倒多数通过, 美国投票反对, 英国弃权。

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 在三月份和四月份两位主席主持下, 进行了各种协商, 以期就草拟关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权限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协商过程中, 我们象去年一样, 遇到了西方国家集团, 或更准确些, 那个集团的一两个成员的阻挠, 他们采取一切手段, 象过去一样坚持对未来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增加“通过实质性的审议来确定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的字样来限制它的职权。

我们已经反复指出, 特别是在1983年8月30日第238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了西方国家集团所提议的权限, “没有考虑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利益和立场, 因为它没有提到有必要进行目的在于缔结一项或几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协定而进行的谈判”(CD/PV.238)。

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支持载于第CD/434号文件中的权限草案。

但是, 社会主义国家在协商中表现了灵活性, 并表示准备考虑西方国家代表的某些观点。例如蒙古代表团就准备考虑西方国家的草案以及3月20日由21国集团提出的修正案。其中载有下述条款: “以便为缔结一项或几项防止外层空间各个方面的军备竞赛的协定进行谈判”。

蒙古代表团将继续努力。它为了达成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 对拟议中的权限第一段提出了修正案, 修改后的行文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以期就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5进行谈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但是，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我们的提案西方国家集团未接受。应当补充一点，21国集团代表团同意采取这项修正案。

蒙古代表团认为，西方国家提出的权限草案之所以有局限性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原则性的目的，即为拟订一项或几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适当协定而进行谈判。该项权限草案实际是空的，绝对不会有助于执行就该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这一主要任务。

对此我愿重复一下我在3月20日的第251次全体会议上所说的话：

“不应再重复本讲坛工作的消极经验，即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却又故意只赋与它一个有限而狭隘的职权范围。如果西方国家的某些代表团再次坚持它们故意进行阻挠的立场，这种态度就只能被看作是回避以务实的精神解决会议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想对我上星期三、4月18日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发言作一些补充。

蒙古代表团极为重视任何真正的裁军措施中的核查问题。在此方面我们主张采取有原则的、合理的和实际的办法来制订有效的核查制度，但不要走极端，不要先入为主。我们过去主张，现在继续主张核查制度要考虑相互利益，并以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为基础。

从这个观点看，我们认为，美国公约草案中所提出的所谓的“开放性邀请”的视察不符合上述原则。同意这样的办法就会有损于各国的利益，并会粗暴地侵犯各国主权。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对美国来说，消除化学武器的威胁——以及消除可怕的化学战的现实——是加强国际安全的最重要的目标。为此，美国决意做到全面、有效、可核查的对化学武器的禁止。

进行这项努力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一九七七年美国和苏联开始进行关于化学武器正式的双边谈判。1980年美国认识到消除化学武器的问题涉及到所有国家，遂将它禁止化学武器的努力转移到本机构来。1983年2月，在这里以及在华盛顿进行了长时期的和紧张的讨论之后，我国代表团提出了关于一项协定内容的详细观点。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参加本会议工作时阐述了我们的详细观点。1983年7月

(菲尔兹先生, 美国)

我国代表团又提交了一份全面的文件, 示范性地提出了销毁化学武器的现场核查程序。去年秋, 为进一步加速这个领域的工作, 美国邀请本会议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代表团参观我们一个正在运行的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参加者亲眼看到了美国实际的销毁程序, 并看到了为确保对销毁进行有效核查所必要的核查措施。

上周, 里根总统又再次派遣副总统布什来日内瓦。为了使谈判进程有新的机动, 副总统来到本机构, 并提交了美国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副总统再次强调指出, 美国重视缔结这样一项禁止公约。副总统也谈到了他个人作为父亲和祖父表示关切, 并表示他本人决心要永久、有效地消除化学武器。这一点无疑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同意的。在此方面, 我希望明白无误的阐明, 无论何时何地发生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美国都要谴责。

这段历史表明, 美国一直在为缔结有效的并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协定努力而真诚地进行着工作。这项努力的基础便是我们上周在此处提交的公约草案。因此我们现在要花一些时间来解释美国这项公约草案的主要条款。

这项公约草案的精髓在它的第一条, 其中载有各项基本禁止。各缔约国应同意不研制、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得、储存、保有或转让化学武器。各缔约国应进一步同意, 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它活动、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不使用化学武器, 不帮助别国进行被禁止的活动。在列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条时, 美国注意到了许多代表团都很重视这一项条款。第一条和第十四条这两条可一并保证该公约作为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补充, 而不是取代。

第二条是关于实施该项公约所必须的术语的定义。可能用作武器的化学品按其危险性被分为三类: “剧毒致死性”、“其它致死性”、以及“其它有害的”。该公约将以不同的方式调节这些不同类型的化学品。最重要的一项定义是“化学武器”的定义。我们利用第 CD/112 号文件中商定的定义理出了这一项定义。另外, 我们还拟订出了“毒性化学品”的定义, 以考虑进中国和本会议其他成员国的观点。“化学武器”的定义非常广以便包括所有不得用于准许用途的致命性的和失能性的化学品及其前体。其中并不包括诸如用于农业、研究、医疗以及国内执法等准许目的的化学品。

毒性化学品的准许的用途在第三条中明确得到保护, 以便和平的化学活动不至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受到重大障碍。为使这些化学品的任何乱用行为能被测到, 第三条还对任何缔约国为防御目的拥有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关键前体限制了量。同样, 该公约草案还规定缔约国只能在唯一的一个设施中生产用于防御目的的剧毒化学品, 每年必须宣布用于防御目的的, 但也可用作武器的所有毒性化学品。对于缔约国可以向其他国家转让的剧毒化学品及关键前体的量也应加以限制。第三条并为用于和平目的的, 如在该公约的细目 A、B 以及 C 中所列的某些类型的化学品, 规定了专门的措施, 以确保这些化学品不会被改用于武器。

一旦公约生效, 各缔约国均应对其现有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过去的转让作出初始宣布。第四、五、六条规定了这些宣布中必须包括的情报。应当要求缔约国在十年期间销毁任何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 每年提供关于这种销毁情况的情报。应当保证给以现场视察, 以督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销毁过程。各项宣布和监测活动的作用在于通过向缔约国提供化学武器及生产设施的全面情况, 并通过他们确认最终销毁, 而建立对遵守的信任。

所提议的公约还包括有助于实施本公约的许多别的规定。正如本会议指出的, 应当按照第七条, 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 以监督公约的实施, 并促进对其遵守情况的核查。这个委员会应当通过其附属机构进行公约所要求的现场核查活动。我们也同意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去年提出的设立执行理事会的想法。这个机构应赋与代表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的责任。

第九、十、十一条规定了解决遵守问题的程序。第九条要求各缔约国就可能发生的任何与公约的目的有关的事项进行协商和合作, 并参加事实调查的查询活动。任何缔约国均可要求协商委员会进行适当的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事实调查的查询活动。事实调查查询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如果任何缔约国因遵守问题尚未解决而感到关切, 可要求协商委员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根据第十条, 各缔约国都应同意进行专门现场视察, 据此各缔约国必须在 24 小时内同意对第三、第五或第六条允许视察的场所之一, 或对任何军方或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场所或设施进行专门视察。过去一周内, 我国代表团听到的评论, 最多的是关于这一条规定。正如副总统布什所强调的, 美国正发出“开放性邀请”, 邀请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到它自己领土上对许多可能的可疑场所进行视察。我们意识到这项规定可能使美国敏感的设施和活动向国际视察开放。但是, 美国为了确保有效地禁止这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完全甘冒这些风险。我们找不到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可能未经宣布的化学武器问题和秘密进行生产设施问题的别的办法。鉴于要付出代价——即为消除对公约未被执行的关切进行必须的某些侵入的可能性——而会有所得, 这一步骤既是合理的也是谨慎的。有些国家反对说, “开放性邀请”的办法不公平, 因为它可能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承受更大的负担。并没有设想和希望造成不平衡。美国代表团准备和其他代表团一道努力, 以确保“开放性邀请”的办法公平地适用于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或类似的措施, 任何国家也不能相信这些武器确实已被禁止。

美国这份公约草案的下一条即第十一条规定了特别现场视察, 可以对第十条未涉及的所有场所进行这种视察。各缔约国除非有非常例外的理由外, 必须同意协商委员会要求进行的特别视察, 这种例外的理由必须解释清楚。在审议所作的解释时, 委员会可以向该缔约国再次提出要求, 如果这项要求再次被拒绝, 则应立即通知安全理事会。

这项公约还需要一系列关于实施公约的详细规定, 我们建议将这些规定列入公约正文的附件。这些附件应是该公约的组成部分。因此, 除了上周提出的公约草案外, 美国还提出了关于这些附件内容的详细观点。

附件一制定了关于协商委员会的许多细节, 包括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条款。它并载有关于设立执行理事会、事实调查小组和技术秘书处的规定, 以及关于该委员会召集特别会议的规定。

附件二阐明了关于核查的细节。本附件(a)节规定了在作出公约所要求的各项公布如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销毁活动等公布时所必须提供的详细情报。附件二的(b)节涉及现场核查包括视察的程序。它为现场视察和现场监测设备的使用作了详细规定, 并为保护视察人员和所在国的权力作了规定。它并规定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保护性活动和销毁活动进行视察和监测。最后, 该节还规定了协商委员会对提出进行特别视察的要求进行评价的标准。

(菲尔兹先生, 美国)

附件三为列有具有合法用途但也有转用于化学武器危险的化学品的三个细目提供了基础。另外, 还有第四个细目, 体现了CD/CW/WP. 30的一些部分, 用以阐明测试这些化学品毒素的方法。

我并希望提请大家注意, 在公约能够生效之前应当采取两项行动。第一, 各缔约国在签署时, 应宣布它是否在任何地方有它控制下的或放置在其领土上的化学武器或生产设施。事实上,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都已经作了这样的声明。我们希望别的国家也这样做。第二, 公约一经开放供签署, 便应召集一次筹备委员会, 计划如何实施公约。应就这些行动达成一致意见, 将其载于与公约有关的, 但独立于公约之外的文件中。

以上是对美国这项公约草案内容的简要评述。我愿指出, 你们研究我们这项草案的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是, 其中大部分是采纳了我们过去在本会议达成的协定和我们过去几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上的讨论。我国政府欣赏和承认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价值, 将继续为它做出贡献, 并已尽可能把有关问题纳入了我们的草案。鉴于该公约草案各项规定的篇幅大又复杂, 无疑, 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是有益的。美国代表团准备承担这项任务, 确实也愿意这样做。我们已组织过一次请所有代表团参加的回答问题的会议, 我们还准备在逐一回答各代表团问题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述。

让我把话讲明, 美国提出这项草案并不是没有研究余地的。但它确实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并将作为美国代表团就各个具体方面按讨论情况提出文件的基础。但并不是只有我们才有创造性, 我们准备并愿意考虑别的办法和别的方案, 只要它们能构成有效的禁止。

正如布什副总统所强调的, 美国代表团希望在这些谈判中同所有的代表团进行密切而认真的协商。我们准备为化学武器公约文本进行谈判的全过程中起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令人不安的是, 有些代表团还在这份草案实际尚未提出以前, 就下决心要批评这份公约草案以及美国的动机。有人指责说, 这项提案仅仅是我国总统进行竞选的一部分活动, 是玩弄的一点点政治手腕, 或者说是争取同意生产二元化学武器的努力的一部分。

(菲尔兹先生, 美国)

这些指责完全是不正当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个机构的谈判。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 美国已四次为此目的提出了重要提案。在此期间, 我国政府选出的排列第二位的最高级官员两次来到日内瓦, 来强调里根总统、美国以及美国人民对裁军谈判会议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所作的承诺。美国并不害怕批评。但是我们希望其他人在批评我们的草案之前, 应仔细地读一下这项草案, 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全面提案。

美国代表团感到鼓舞的是大多数代表团都在认真地对待这些谈判, 工作正在开始紧张地进行。中国代表团提交的重要工作文件 CD/443, 我们的专家正在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很高兴听到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于 2 月 21 日关于销毁化学武器进行视察的发言。他 4 月 18 日所说将对美国这项公约草案仔细研究, 这番话更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题为“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工作效益”的工作文件 CD/435 所载的一系列建设性建议。我们希望对这些建议加以进一步的研讨, 并在适当时加以实施。1984 年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非常有益的文件, 如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代表团提出的工作文件。另外, 由于一些代表团表现了灵活性, 在作出关键性的定义方面取得了进展。遗憾的是, 仍然有些重要的问题是有些代表团显然不准备讨论和解决的——例如, 宣布和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问题。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我们希望这次休会将使大家冷静地考虑谈判的各个方面应取得进展的迫切需要。

就美国代表团而言, 它将在厄克于斯大使的得力领导下, 竭尽自己的一切来确保谈判尽早地胜利完成。引用副总统布什的一句话, “我们在这些谈判中的目的将是实际的——诚恳而努力地工作; 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取得真正的结果”。

人道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取得真正的结果并不容易, 但是, 我国代表团, 我自己, 我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致力于实现永远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我们知道, 本会议的成员同样致力于这个目标, 我相信, 有了这个决心, 我们就能成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主席先生, 苏联代表团今天发言是为了对裁军谈判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结果作一评价。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苏联代表团和许多别的国家代表团一样为了使裁军谈判会议脱离长期的严重危机, 在今年做出了新的努力。没有哪一个与军备竞赛限制有关的问题苏联代表团没有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 提出具体的提案和建议或提出工作文件的。我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力求考虑到一切国家的安全利益, 符合平等或同等安全的原则, 仅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进行裁军谈判。

例如, 让我们提一下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是会议议程上的优先项目。苏联单方面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就为这个领域的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随后提出的关于冻结核军备和停止爆炸的建议, 也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谈判取得进展。

在本届会议中, 苏联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倡议。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K·U·契尔年科在他 1984 年 3 月 2 日的讲话中, 提出了关于拟订某些支配核武器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的建议。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候就共同承认这种准则并赋予它们强制的性质的问题同别的核武器国家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而是应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提案已经简要地载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工作文件(CD/484 号)之中。

在这届会议中苏联代表团重申它有志于尽早解决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首要问题之一——禁止核试验。特别是, 我们表示准备在关于核禁试的谈判的范围内考虑交换关于气团的放射性的资料的问题。

在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上我们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几乎没人会否认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国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是推动会议审议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活动的主要的促进力量。

苏联代表团就我们时代的另一优先问题——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提案。提案是以禁止在外空和从外空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的形式提出的, 该草案现在已在谈判桌上。苏联的这项草案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各代表团对它作了广泛的评论。

实施一系列旨在制止海上军备竞赛的措施是朝向消除军事威胁和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建议载于 1984 年 4 月 9 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A·A·葛罗米柯致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 利亚尔先生的信中,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也通知了会议的参加者。

这些就是苏联在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期提出的新的提案。

同时, 当我们回顾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春季会期的情况时, 我们只得承认, 尽管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采取了一些建设性的步骤, 会议仍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另外,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今天在许多问题上比几年前以前距达成协议离得更远。会议除了一两个附属机构以外, 在事实上已失去了所有的附属工作机构。关于诸如综合裁军方案和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这样重要的议程项目的讨论的情况也完全令人失望。在某种程度上, 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诸位防止核战争, 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禁止核试验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些最高优先项目上, 会议甚至尚未能就工作安排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为了进行谈判以期获得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仅仅一方具有意愿是不够的。另一方也必须对建设性的谈判表现出兴趣、必须为紧迫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必须清除最近在裁军领域的国际对话的道路上堆积的障碍。但是, 在本届会议中我们却面对着我们的谈判伙伴所采取的恰恰相反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当1984年会期的头一半即将结束时没有出现任何显著成果的原因。

在裁军谈判会议中, 反对取得进展的人使用了一大套不同手段来阻止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这些手段包括直接拒绝进行谈判、把人为的权限强加给会议的附属机构, 并就已进行了会谈的问题故意提出对方所不能接受的提案。

苏联代表团于2月7日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本届会议的第一次发言中, 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军备限制问题上的政策。我们指出, 美国和北约国家采取了触发军备竞赛新的螺旋形上升的方针来阻碍谈判, 利用谈判来掩盖它们所进行的军国主义的准备, 而最近, 如经验所表明, 也用来掩盖其特别想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的用心的言词。

在作了这项发言之后, 某些西方国家代表团责备我们对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于美国关于军备限制的政策所做的评价过于悲观。但是1984年会议第一期的审议工作证实了我们的估价是正确的。美国继续阻挠裁军领域取得任何进展,并利用它参加谈判来进行宣传以掩盖其真正的方针,即旨在夺取对苏联的军事优势、在以前尚不存在军备竞赛的地方例如外空发起军备竞赛,并在世界的那些早已为美国军工企业强加军备竞赛的地区促使其加速进行竞赛。

我要说,美国代表团于1984年4月18日提出的广予宣传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是美国方面对待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的态度的最新的生动例子。与所有的诺言相反,即使美国对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阻挠立场有所改变的话,也绝不是变得好一些。过去为了阻挠缔结禁止化学武器的协定,美国坚持一项核查制度,根据这项制度,所有其它国家都应在外国最初提出要求时,允许外国视察员进入任何化学设施,而不论其是否与生产化学武器有任何关系。现在华盛顿提议各国应当事先无条件地同意“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毫不阻止外国视察者进入。

几乎不需要很敏锐的观察,就可以明白此处所涉及的并不是真正为取得严格遵守协定的信任所必要的核查,顺便提一下苏联对于严格遵守协定的关心并不亚于美国。主要之点是在于——提出不受阻挠地进入别国领土的要求以继续阻挠达成禁止化学武器的协定。

事实上,美国这项草案只能使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倒退许多年。该草案不仅走极端,不仅取消了多年来许多国家为制订对核查问题的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所做的努力,而且是建立在完全是歧视性的基础之上的,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置于不平等的位置。美国代表今天的发言也承认了这点。实施这项草案将会对许多国家,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不仅是它们的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利益造成损害。

今天美国代表提到了苏联代表团2月21日的发言,我要提一下这项发言中所说的话。我从英文译文中引用,“我们今天宣布在原则上准备积极考虑关于在销毁储存的专门设施常驻国际监督代表的提案,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的谈判伙伴也应证明他们不是在言词上而是在行动上准备寻求共同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而现在我们收到了美国的草案,该草案本来应当如我们所希望的也考虑到苏联的观点,美国是很了解我们的观点的,因为我们已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了8年的谈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提出这样一项有意使苏联和许多别的国家不能接受的提案呢？顺便指出，许多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了，该提案是有意弄得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它们不会指望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不，当然不会，谁也不会指望这一点。而达成协议简直不是该草案的拟订者的目标。我们深信提出这项草案仅仅是试图以对这项美国草案的大肆宣扬来掩盖美国政府所真正从事的事情，即加紧准备实施里根总统所宣布的耗资1百亿美元的“重整美国化学军备”的方案。

以上就是苏联代表团对于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春季会期的结果的看法。如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并不能引起特别乐观的情绪。

但是沉溺于绝望的悲观主义也是危险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审议工作经验表明，只有在具有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谈判和达成协定和妥协的共同意愿时，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才可能是有效和有成就的。

苏联代表团并不缺乏这种意愿。正如苏联外交部长A·A·葛罗米柯最近所指出的，“注定失败的哲学是与苏联及其政策格格不入的。我们拒绝“恐怖平衡”和使紧张局势加剧的政策。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的一次会议重申了苏联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仍然相信有可能维持和加强和平”。

苏联代表团将同其他代表团一道继续力争在本年度会议的第二期就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达成协定。

米德尔顿先生（英国）：主席先生，在春季会期的这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欢迎你担任会议主席时间已经晚了一些。但是我仍然希望表示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这个月的工作感到很高兴，我们并对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指导我们三月份的工作表示感谢。

本届会议的全体会议上的辩论已为争论而受到损害，我国代表团并无意于参加争论。但是我首先要简短地评论一下有人反复提出的“支持证明可能赢得核战争以及可以以为此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念”的指控。我想，这些话不是针对我国代表团的。英国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作用的政策已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6月23日作了阐述。她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所作的发言无疑地你们许多人都很熟悉，

(米德尔顿先生，英国)

但是仍然需要重申一下。她说：“在核交战中将不会有胜利者。在核国家之间发起战争确实不是理性的选择。这些武器只是就防止战争来说才是成功的。37年来核武器确实使东西方之间保持了和平。这是一个无法估价的成就。如果有意愿和善意，威慑可以在经大幅度裁减的核武器水平上得到维持。”我也要提到北约领导人所做出的庄严的集体承诺，除非是对攻击做出反应，否则绝不使用北约的核武器或常规武器。

英国政府坚定承诺要实现核武器裁减。正如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卢斯先生于2月14日在这个会议上所说的，首先需要进行的是由掌握着这个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就大幅度裁减其军备问题进行谈判。英国政府反复强调他们希望看到在去年底中断的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尽快地恢复。美国副总统4月18日在这个会议上也促请苏联领导人恢复这些重要谈判，世界人民对这些谈判寄托了很多希望。我国代表团强烈支持这项呼吁。

我国政府非常严肃地看待化学武器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有些国家不仅拥有这些武器的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储存，而且他们最近还使用了这些武器，公然蔑视国际的谴责。因此此时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促成一项全面禁止这些武器的条约。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就一项条约达成协议将成为一项真正裁军的措施和对国际安全的一个重大的贡献。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至少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在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和成立一些讨论各具体问题的工作小组的问题上我们迅速达成了协议。在这些小组内也取得了一些进展。2月14日，卢斯先生就质疑性视察提出了一份文件，这是联合王国在裁军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中的最后一份文件。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工作小组和双边会谈中都对这些建议表示了兴趣而且进行了严肃的讨论。

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先生提出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英国政府热烈支持美国最近这一项主动行动，它将是在全面禁止这些可怕的武器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国政府同意美国这种观点：需要有严格的核查以向各国保证，以后任何公约的禁止条款都能够得到遵守。我国代表团从尊敬的苏联代表4月18日的发言中高兴地注意到，该国代表团准备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中，同意各种不同的核查办法，其中包括强制性的有系统的视察，

(米德尔顿先生，英国)

或者是常驻的国际现场视察以及质疑性视察。我国代表团认为，把这两种核查类型结合起来是必要的。这不仅使人们相信所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和生产设施都已加以销毁，而且在长远的基础上，也使人们相信他们不会秘密地恢复或建立起来。尽管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某些代表团的否定的反应，我们仍然希望，美国提出的草案将会由于它全面的性质和丰富的思想而大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作。这个建议的复杂性，实际上是这个议题本身的复杂性几乎没有必要强调，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参加本届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将在以后几个星期内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仔细的研究，并且在复会时象我国代表团打算要做的那样，准备进行详细的谈判。

除了化学武器以外，这届会议的进展情况不佳。我们在本届会议之初所表示的，随着委员会改称为会议，进行工作的途径也会有所改变的希望并没有实现。我们已设立的处理我们工作中具体方面的四个特设委员会中，有两个尚未召集会议，而有一个仅仅才成立了一个星期。在进行了四周的讨论并且在历任主席进行了大量的和值得称赞的努力之后我们仍然未能就另外三个特设委员会的权限达成协议。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这种情况感到关切，尽管我们对于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者应采用的补救办法并没有一致看法。

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未能克服程序问题上的障碍并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关于“谈判”和会议在这方面的作用的概念不相同。我们注意到在某些代表团的態度中有一种根本性的逻辑推理序列。这个会议是一个谈判机构；会议设有一些特设委员会作为附属机构；因此，一切特设委员会也必须是谈判机构。这种简单的三段论法具有一种欺骗性。说它具有欺骗性是因为它不顾各代表团之间的真正的实质性的分歧，以及就不同的议程项目所达成的不同程度的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重视会议作为谈判机构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能够开始谈判之前，我们必须共同把一个目的弄清楚，然后再建立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基础。在含混而不明确的基础上同意进行谈判，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无疑将造成失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对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可行的措施”应当采取什么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以前我们未能同意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我很高兴的是，现在已

(米德尔顿先生, 英国)

有了一致意见, 认为确定这种措施的阶段是根本性的初步工作, 我们并承认 21 国集团在此方面表现出的灵活性。

但是我们还得就权限问题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 如果在去年夏天采取了西方国家在非正式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的话, 或者如果在这届会议初期采取了这个建议的话, 我们就至少能就这个问题的实质上开始讨论。相反的, 由于坚持形式——由于坚持要求仅仅在一个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还得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外层空间的程序性的辩论的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我们已经在原则上同意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我们仍在它的明确的职权范围问题上争论不休。又是“谈判”这个词引起了困难; 又是企图在我们知道我们要谈判什么之前开始谈判, 又是企图在阻碍着我们处理问题的实质的职权范围内解决根本性的立场分歧。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构成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进行工作。

我们在设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方面的问题有些不同。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存在着哪些根本性的意见分歧。我们并不认为仅靠开始进行谈判就能解决这些分歧; 我们也不能象某些代表团那样故意说这些分歧并不存在。这些困难不能靠有选择的引用关于过去的谈判的报告中的话或者依靠这个会议之外的设想中的权威就能得到解决的。我们认为在开始谈判之前, 会议应在多边的基础上试着建立共同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正如卢斯先生在 2 月 14 日所说的“当我们在根本的原则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时候, 故意说我们可以开始谈判条约的语言这不会对谁有任何好处”。我们仍然准备积极参加特设委员会以期解决这些困难问题。

在 3 月份随着科学专家小组提交第三份报告而出现了较好的局面,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此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支持科学专家小组进一步的工作并将为之作出贡献, 我们并愿对该小组主席奥拉·达尔曼博士及科学秘书林达尔博士的工作表示特别的敬意。挪威和裁军谈判会议其他非成员国的贡献大大增加了科学专家小组工作的价值。

科学专家小组已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但是我们认为说该小组已“澄清了所有有关的问题”是把事情过份地简单化了。我们看到报告中甚至在数据交换方面还

(米德尔顿先生，英国)

包含着相当多的困难。我们还面临着一项重大的任务：在不同的国家地震中心的技术能力方面如何达到更大的协调一致。有必要在参加的地震台站安装现代化的系统，并在南半球设立质量更高的台站。只有在有关各国都准备采取必要的步骤时才有可能在此方面有所改善。应在多大的程度上提供二级数据的问题尚存在着意见分歧。我们绝不能忘记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仅与数据交换有关，它并不直接回答与核爆炸的检测与识别有关的重要问题。

最后，对于我们终于在上周在以前的职权范围的基础上恢复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这一事实还是可以感到有些高兴。但是局外人会有理由问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唯一的障碍其实就是一个集团提出的要根本修改该特设委员会权限的提案，它提议该项权限应能就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面的条约进行谈判——这项提案一直遭到许多代表团的拒绝，其理由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已阐明。这种策略的动机我们尚不得而知，其唯一的结果便是使该委员会拖延至本届会议的最后几周才设立。我们希望在经过这番拖延之后，当我们在六月份复会时该委员会的工作在维沃达大使的主持下迅速开始。

主席：感谢英国大使的发言及其对我所讲的一番善意的话。

根据会议第249次全体会议的決定，现在请芬兰代表皮耶蒂宁大使发言。

皮耶蒂宁先生（芬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主席的职务。我还要对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表示敬意，他非常熟练地指导了会议3月份的工作。

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不仅有增无已，而且它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支配当今国际关系的似乎是猜疑和恐惧而不是合作与信任。然而要解决今天这些紧迫的问题首先需要在军事大国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除此以外，也应在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国际社会的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我国代表团已就裁军谈判会议今年这次会议议程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发言。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回到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但我先要向你们讲述我们关于会议

(皮耶蒂宁先生, 芬兰)

议程项目6,即消极安全保证的一些想法。我是作为一个无核武器的中立小国的代表来讲的。这个国家已正式地,并最全面地放弃了所谓核选择,因而显然有资格成为一个其地位应在所有情况下受到尊重的国家。我们已关切地注意到这个机构至今未能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或以其它形式使消极安全保证的概念有具体的内容。

这是芬兰感到严重关切的问题。芬兰在其裁军政策中一直积极努力发展这个概念,并且已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早期的工作阶段提出了它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我愿特别提到芬兰于1980年提交的第CD/75号文件。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在去年和今年的工作期间都没有就消极安全保证进行具体的谈判而感到遗憾。

在我发言之初,我愿强调指出,只要核武器存在,就没有安全的保证。同样地,没有任何保证能够代替核裁军,核裁军应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在具有真正的核裁军措施之前,应当积极探索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办法和手段。无核武器国家承诺的无核地位就为加强国际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加强它们的地位和尊重这种地位就只会成为一种稳定因素,对整个国际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减少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意图有猜疑的危险。同时,应当以无核武器国家的观点对待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尽管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顾虑是被承认的,我们认为就消极安全保证进行谈判的目标是,而且必须是,为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作一些事情。就芬兰而论,它欢迎能有助于消除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危险的所有具体想法。

核武器技术,特别是战略理论的迅速发展,直接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而使它们的安全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有关的这些国家反对这种趋势的力量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发展消极安全保证的概念便是一个这样的措施。

迄今为止,这个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仅仅包括把无核武器国家作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对其直接使用或直接威胁使用核武器。但是很容易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威胁可以是间接的,即所涉及的无核武器国家自己并不打算成为使用或威胁使用的对象。因此,芬兰政府认为,消极安全保证的概念应当是全面的,不仅应包括一般所讨论的使用和威胁使用,而且还应包括其他可能影响到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涉及使用核武器的所有不测事件。作为这种间接威胁的例子,我可以提到核导弹越出其预定的轨道以及在远离国界的地方进行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微粒回降

(皮耶蒂宁先生, 芬兰)

的危险这种可能性。利用无核武器国家的大气层空间的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问题是一个例子。从这些国家的观点来看, 现代运载系统是特别成问题的。国际法已经禁止了对别国使用武力, 并保证了各国边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但是尽管存在着这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则, 无可争辩的是, 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已使应考虑消极安全保证概念的法律和政治范围增加了新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 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范围应加以扩大以便在国际谈判中把我上面提到的消极安全保证的这些方面包括进去。现在所需要的是进行旨在将无核武器国家排除于一切核战略考虑之外的具体的谈判。

已经放弃核选择的国家无权少做事情。

无核武器国家有权避免核军备竞赛、发展军事学说和确定有关国家军事态势的阶段战略计划的直接影响。除非采取对策, 否则正在进行的事态发展就可能破坏整个消极安全保证的概念, 并使特别是这个机构的努力遭到挫折。我国代表们希望, 在裁军会议这次年会的后一期会期, 将以应有的认真态度处理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

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一直是芬兰裁军政策的另一个基本的优先项目。我们一直定期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提交我们关于在这个领域长时期执行核查计划的结果的报告。现在我可以宣布, 有一本新的题为“对经选择的核查化学裁军的科学方法的技术鉴定”的所谓“蓝皮书”将于六月份交给有关的特设委员会。芬兰的这份文献在今年将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提出。我们现在打算提交一份对实施这个十年计划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的全面的分析。

这份工作文件拟涉及核查的一切方面。它特别要讨论未来公约可能要求进行的核查任务以及核查化学剂的技术手段, 包括对收集样品的自动监测、机动场地实验室和中心实验室。对各种技术手段的综合使用提供了说明。它并不提供数字数据, 而是对技术方法加以说明, 因而能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

近来在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使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实现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事态发展。其中特别包括苏联2月份关于核查的某些方面的发言和上周由美国副总统提交的化学武器条约草案。我们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是这些政府愿意在谈判期间千方百计地解决面临裁军谈判会议的困难问题的一种迹象。我们还注意到另一个积极的因素, 有

(皮耶蒂宁先生, 芬兰)

关的附属机构已能开始进行实际的谈判。

我们期望在夏季会议期间, 委员会就能取得初步的具体成果。芬兰一如既往, 准备在谈判中, 特别是核查技术领域方面, 作出贡献。

最后,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提出芬兰有兴趣作为本会议的正式成员。如果芬兰被选为正式成员, 它将加强和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方面的合作, 特别是与不属于军事联盟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并将保证, 为了能够迅速地对谈判会议各种活动的所有领域的工作作出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 芬兰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将配备必要的人员以及其他设施。

主席: 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所讲的善意的话。

现在请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发言。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 本届会议的春季会期今天将要结束了, 法国代表希望就此发表一些意见。

怎样来估价这次会议的结果自然须依各代表团对裁军各方面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而定,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都有一些理由感到满意但也有一些理由感到失望。

说到令人满意的方面, 法国代表团认为首要的是迅速恢复并扩大了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些谈判中有多少次濒于危境, 同时这些谈判进行得多么及时; 我们希望在不太远的将来这些谈判将会导致国际上历来缔结的一项最重要的裁军条约。

在有关化学武器的工作上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程序问题从未压倒过实质性的问题——这确实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最为重要的是, 人们已经对这些谈判作出了极为有价值的贡献。按日期的顺序来说, 第一项是我们的苏联同事伊斯拉耶利安大使2月21日作的发言。他就现场视察销毁储存的工作所阐述的立场表现出在协调关于核查的一项根本条件的观点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还得到其他一些极为有价值的贡献, 包括中国作出的一项贡献, 它是一项特别就定义有关问题进行澄清和调解值得注意的尝试。法国代表团也十分欣赏联合王国、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提交的技术文件。而我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们自己也急切希望作出自己的贡献。

美国副总统提交的美国的条约草案是本次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 对此我们以最满意的心情表示欢迎。这一文件十分重要, 我们正在认真加以研究。

特设委员会及其三个工作小组对于委托给它们的任务采取了严肃而坚决的态度来处理。它们取得的成果也许会显得参差不齐, 但是所遇到的困难也并不是一样的。在定义的问题上人们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进展。

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是, 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对解决某些问题将采取一些步骤并从业已完成的工作取得最大的益处。在这一点上我们寄厚望于担任主席职务者。法国代表团要祝贺我们的瑞典同行厄克于斯大使及工作小组主席杜瓦尔特先生、阿克爾曼先生及蒂利克先生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也怀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希望今年夏季将就与禁止使用及其核查有关的问题举行谈判。这些问题尚未交给一个工作小组来处理, 但是将在我们的加拿大同事比斯利大使主持的协商中予以讨论。我们信任他并祝愿他的工作一帆风顺。

这一工作及已经取得的进展应为一个新的阶段即起草一项公约的工作铺平道路。本会议现在已经具备了它执行这一重要任务所必需的手段: 在制订这一文本时应重视美国的条约草案和在厄克于斯大使主持下起草的各项文件。

最使我们失望的是, 关于就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设立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进行的协商没有取得成功。法国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以及本会议对它的审议工作是最为重要的。虽然我们对有关的职权范围仍然持有一种坦率的态度, 但是我们认为, 有了接触小组制订的方案, 在必要情况下再由主席作一次解释性发言, 就能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领域中进行必要的摸索工作; 而且这样的工作本来可能用本届会议上为一个特设委员会留出的全部时间来开始从事。我们深感遗憾的是, 有一个国家集团反对一项本可使工作开始的安排。

法国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第一次发言中说过, 如果我们立刻把时间专用到基本的筹备工作上去, 将比为了得到一个目标更高的职权范围而进行的可能是毫无结果的讨论而冒把时间浪费掉的危险较明智些。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幸而言中,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在夏季会议上可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

我要谈一谈有关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所进行的协商。法国代表团在3月6日所作的发言中回顾了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去年, 我们尽管持有十分保留的态度, 但仍然同意将这一议程项目列入议程, 以便结束那种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可悲的肆虐阻挠的局面。它认为, 只在根据定义来说实现核裁军即达

到排除了使用核武器的这一地步上, 该项目才与裁军有具体的联系。

我们指出, 议程项目 3 并不是同防止核战争作为一个单独的具体问题有关联的, 我们对这一点本来就不赞成, 而与议程项目 3 有关的是“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正如我们常表明的那样, 这明显地意味着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不能同防止战争本身即常规战争的问题分开处理。争论的问题是安全问题, 或换句话说说是安全所需的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的问题。为什么在目前情况下核因素仍然是我国及其他国家安全所需的平衡的一个基本条件, 这个经常谈到的理由我就不准备再说了。我们还注意到我们对安全的概念在这一机构内所引起的反对意见。我们注意到各方面人士正在要求不仅要通过核裁军, 还要主要通过禁止使用或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毫不拖延地消除核因素。但是我们确信, 这样的措施会导致政治及战略上的不稳定局面, 从而造成影响会远远波及到各盟国以外地区的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在本会议听到的反对意见显然限制了我们所能指望议程项目 3 能取得的结果。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必须审议这个项目。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主席您主持的, 在就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试图找到可为人们接受的一项附属机构职权范围的方案的协商的原因。法国代表团要称赞这些协商所持有的平静气氛、良好意愿及和解精神。我们特别欣赏我们尊敬的印度同事表现出来的坦率精神和谅解的态度, 他代表中立国家及不结盟国家发表意见。

我们已仔细研究了杜贝大使提出的各项建议, 这些建议肯定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可能性。

我们同意他的意见, 认为要通过一种谈判的职权范围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项对各方关心的问题都兼顾的, 内容十分广泛的方案才可能提供一条出路。因此我们支持我们的比利时同事德帕斯大使提出的建议。这项建议谈到安全的概念, 安全本质上是与防止核战争及任何形式的战争的问题相联系的, 这一方案还要求考虑到所有现有的及今后的建议。

我们认为, 如果必不可少的和解精神最终占了上风, 特别是在要求设立一个附属机构的各代表团中占了上风, 那么接触小组进行的协商就会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提供基础。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我们不了解。审议议程项目 3 是否会确定出那些适宜于进行具体谈判的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谈判能与属于核武器国家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发生关系。

但是, 不管会出现什么问题 and 什么样的意见分歧, 也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程序, 我们都赞成深入考虑议程项目 3 包含的、所有问题。这是些对所有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关注的问题, 而眼前只有裁军谈判会议是可以举行这类讨论的唯一场所。

主席先生,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代表法国代表团祝贺并感谢您在一个充满问题和困难的阶段, 依靠您的权威和能力, 谦恭有礼的态度和始终不渝的耐心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及他致主席本人的有好言词。

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今天我们的会议将休会只是一个权宜措施, 没有其他的意思。我们要为纽约的重要裁军会议让路。我们既不必对我们的春季会议提出任何报告, 也不必对我们的工作作任何正式的评价。然而, 人们不禁想评价一下我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前三个月的工作。我想我不是唯一个人很想这么做的人。无论如何总的情况并不都是很好的。本届会议到目前为止给人留下了矛盾的印象。我们既看到了积极的因素, 也看到了消极的因素。

让我首先来从总的情况的消极方面说起。这次集会又一次在程序问题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去年几乎整个春季会期都浪费在程序性问题上, 很明显这一教训并没有为人们所汲取。其结果是, 在我们工作任务中的一些实质性领域, 我们还没有超出筹备阶段。这都妨碍我们来创造一个环境, 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认真的讨论一些问题, 并共同认真探求一些可以开始进行制订规章的和谈判的、并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领域。其结果是, 我们现在仍停留在独白的阶段。我们能够进行真正的辩论从而取得进展的机会都失去了。许多代表团看来把形式主义和词义学看得比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内容还要重要。这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遗憾。我并不想批评某一个具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体的人，而是指出在讨论中普遍存在的~~不幸局面~~。

这样的局面应激发我们寻求有否可能认真地改善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尽管议事规则中没有任何一条迫使我要这样做，但是不幸，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惯例：即本会议的任何附属机构都要具备一个已深入到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之中的职权范围。难道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是屈服于一种荒谬的说法吗？我们不是企求太多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在深入讨论问题之前，就试着以职权范围的少数几行文字把关于安全理论方面的根本分歧协调一致吗？如果把每一个附属机构的活动领域作一个笼统的规定，而由工作机构本身，通过各代表团之间积极的辩论来具体确定其任务，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在这一方面，我发现南斯拉夫维达斯大使经常提出的想法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我国代表团认为，为各特设委员会以及其他一切附属机构确定简单的、不具体的职权范围模式应是我们这个会议进行研究的一项适当议题（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通过），以便使本会议今后能够免却就职权范围进行漫长的讨论。请让我表示这样一个希望：我们这个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智囊团”的七人小组不久将能够以这种心情为我们大家提出具体的建议。

看到本会议没有能够就一个关于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具体的工作机构的职权范围达成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特别感到遗憾。很明显，这一议题引起了各代表团的兴趣，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因此，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尽管这么多代表团都表现了灵活性。但是，仍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实际的、组织方面的解决办法。我们没有能够处理好防止核战争这个紧迫的议题，这就妨碍我们以公正的方式解决本会议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期望我们这次休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进展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也许不至于落空。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几个方面一样，我们不能够解决程序方面的困难特别令人感到悲哀，因为这些困难剥夺了主席先生您的耐心劳动应得到的果实。然而，您在幕后所进行的多方协商中所表现的孜孜不倦和富有创造性的品质并非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将会铭记您在担任主席这一时期的情况。您是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常识和异乎寻常的决心的人。

主席先生，但是，我们总的情况的消极面幸而由于不少积极的方面而得到弥补。

首先让我强调指出，尽管在年初国际气氛特别紧张，但是我们这个会议的春季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会议在一个新的、更为有威望的名称下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开始工作并表现出普通愿意加强联系, 而不是破坏这种联系。至于说所有裁军和军备控制事务将会出现完全静滞不前的局面的各种预言证明都是不正确的。如同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会议以及最近刚刚恢复的中欧相互均衡减少兵力的维也纳会谈一样, 我们这个会议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已能以稳健的速度向前发展, 而且大多数代表团由于习惯于认真的工作和合情合理的辩论已摒弃了那些无区别的无根据的论战, 这显然是一部分国家非这么做不可的, 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愿意合作。

然而, 令人感到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化学武器方面已取得了量的飞跃, 本会议在二月份以迅速而坚决的步骤设立了一个具有全面的、有远见的职权范围的化学武器委员会提供了适当的环境, 使许多代表团可以继续将它们新的、建设性意见记录在案。在一些步骤中, 我们代表团曾努力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但是我还想举出苏联代表团的例子作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苏联再次对化学武器这一议题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兴趣, 它在二月初的一次发言中, 把这个议题定为本会议谈判的一个优先议题之一。苏联提出的几个建议, 特别是在 2 月 21 日的一次重要的政策性发言中所提出的建议, 以及它宣布在原则上愿意为解决公约的所有悬而未决的核查问题作出有益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是有利的, 并且对今后的谈判会起重要作用。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 1984 年 4 月 18 日所作的承诺; 即苏联方面将对美国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即使在他今天上午所作的更具有批评性的讲话中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同他这个令人欢迎承诺相矛盾的内容。

先由国务卿舒尔茨于 1 月 16 日正式宣布, 并于 4 月 18 日由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提交的美国草案, 肯定是我们这个春季会议的一件重大事件。毫无疑问, 这个草案表明两个主要的军事大国之一所作的空前的努力, 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中内在的各种问题提供复杂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 这个草案不仅表明了美国关于未来公约的各个方面的详细观点, 而且还包括了裁军谈判会议许多其他代表团所提出的意见, 实际上就是去年谈判进程的集体成果。我国代表团相信, 美国的方案将会成为今后谈判的重要基础, 并且甚至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一文件证明了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治上的决心, 希望看到这些谈判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圆满结果。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布什副总统提出保证，而且刚才菲尔兹大使也重复了这个保证：即美国提出他们的草案是具有在必要时提供谈判的灵活性的意图的。这一保证增强了这一事件的意义。

对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议题来说，完全可以预料到，在美国的草案中包括有许多将会在本会议中引起分歧的方面。而且在事实上已经部分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关于核查的一些观点是新的，也是大胆的。不管各国代表团对于所建议的核查制度的某些部分可能采取什么立场，但必须承认这个草案提供了应能促进认真争论的新的推动力。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应从表面价值来看待美国关于核查的观点，特别是它关于专门的和质疑性核查的新概念。关于为核查执行情况而进行公开邀请的强制性视察的条款表明这是一种空前的大胆措施。对这一方面的建议进行评价的代表团不应只看到美国要求别的国家拿出什么，而且应该看到它自己准备拿出什么来。提出这种开放性邀请的作法是以相互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大国为了保证一项裁军公约得到执行而准备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是一种新现象。美国代表团愿意参加共同义务，为国际视察而公开它敏感的军事设施中实质性部分，这给我国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谈判最终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应把这个主动提出的建议当作是美国态度的力量所在。我国代表团建议所有各国代表团仍要认真对待这种公开邀请理论的政治意义。它为改变各国政府在国家安全这一重要领域相互对待的方式提供了一项眼光远大、而且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办法。这种新的概念同某些认为神秘化和极度保密就是国家主权的核心的陈旧观点相对比就要强得多。这种新的创造性的态度值得深入讨论，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各国代表团真诚地参加这一讨论。

就我国而言，我国准备接受美国草案中所包括的要求。即将到来的会议之间的休会时期将会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个有利的时机，以便对那些乍看起来似乎同我们各国代表团在过去的谈判中所持的观点不同的条款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我国代表团提出过几个关于核查问题的工作文件，最后一个文件就是CD/326号文件，已经按照未来条约对草案所要求的那样用正式的语言写出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全面的，相互平衡的国际核查制度，在这样一个制度中，要由效率这唯一的标准来确定并测量侵入性的程度和视察级别。从这个优点来看，美国草案的详细核查条款是应得到全面肯定的评价。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从一个中欧国家的立场来看，销毁化学武器是一个最为紧迫的目标，但是对销毁储存进行核查的手续，不应搞得很复杂，超过公约目的所要求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将必须对美国提案中关于处理初始公布进行核查的那一部分内容进行彻底的而且是带有某种犹豫心情的研究。我已经谈到 1984 年 2 月 21 日苏联代表团关于对销毁储存的核查的发言，这是一个现在看起来似乎在原则上将达成协商一致的领域。对于销毁储存的更为详细的核查问题，我们将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对此，我国代表团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

我们同样关注的是，美国草案中所规定的为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所设想的手续不应使民用化学工业承担不必要的负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化学工业是整个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设法避免那些不会直接提高核查效率的侵入性措施是一种合理的考虑。我们应为在下列两个相对的原则之间建立正确的平衡而共同努力：第一个原则就是公约应能发挥作用而且国际核查将是行之有效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公约对化学工业发展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不应造成过分的抑制和麻烦费用很高的管制。在我们对美国草案中关于对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选择性的，随机的核查这种有关条款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的基础上。必须认真地制订出许多细节。

尊敬的伊朗副外长今天强有力地提醒我们，永久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在它们那个地区以及在其他地区都是一样。联邦政府以极其关切的心情注意到应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到伊朗去调查所声称的在伊朗和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化学战剂情况的专家所提供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必须设想冲突中有一方的确使用了化学武器。联邦政府已公开，而且毫不含糊地阐明了对所发生情况的立场。它对使用化学武器表示遗憾，并且谴责这种使用是明显地违反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此种武器的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联合国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再次说明尽早缔结一项世界性的全面的可进行可靠核查的禁止所有化学武器的条约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让我回过来谈一谈我们在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中富有希望的更加积极的方面。主席先生，您和诸位同事都知道我们向本会议各成员国以及向所有感兴趣的观察员发出的邀请，请他们参加定于 1984 年 6 月 12 日下午至 14 日上午在德国北部举行的国际化学武器讨论会。如同我在每一封邀请信中所强调的那样，联邦政府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目的在于将这一讨论会尽可能密切地纳入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中。因此，我对于对邀请所作出的积极反应特别表示感激。而且我还想对所有已指定参加人员的各国代表团表示感谢。现在已向所有被提名参加者发出了信件。对他们的友好反应表示感谢并确定出发时间以及有关本计划的其他内容。我国代表团正期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欢迎所有参加者，并希望这次讨论会的结果将有益于我们的谈判。

在结束发言时让我回过头来谈一谈国际裁军进程的较为远大的前景。几天之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开会并发表了反映该会议事项的公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已对华沙条约外交部长所发出的公报的建设性的调子表示欢迎，并认为这证实了它自己同北大西洋联盟各伙伴共同为在广泛的基础上加强同东欧各国及苏联对话和合作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联邦政府从该公报的措词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迹象，即华沙条约外交部长已考虑到 1983 年 12 月北大西洋联盟布鲁塞尔宣言中所包含的意思。该公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在谈判的基础上解决的，为了回到谈判中来不应错过任何机会。这是符合我国政府的想法的。然而，这还必须适用于最近被苏联所中断的重要的核谈判。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在它们的布鲁塞尔宣言中强调指出并且在此后反复强调，它们愿意在任何时间、不加任何先决条件地进行关于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谈判。鉴于这一个议题对全球安全以及对指派给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我认为我在要休会时回顾这一建议是适当的。

主席：现在，今天上午安排的内容到此结束。如无反对意见，我提议全体会议现在休会，下午三时复会。全体会议休会。

全体会议于下午 1 时休会并于下午 3 时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复会。

现在，我提议我们听取登记下午发言的代表发言。在我这里登记发言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及匈牙利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您在本月份的活动表示赞赏，从个人方面，我还想对您能够如此准确无误地读出我的名字表示赞赏。

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们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同在我之前发言的几位代表一样，认为简单的回顾一下在最近三个月内所取得的成就是适当的。

在今年的议程中，一些优先事项，其中包括防止核战争，得到了适当的位置。在通过今年的这个议程之后，我国代表团曾希望本会议很快就能够有效地处理所有的议程项目。我们这一集团在本届会议一开始就实际上表明有效处理是什么意思。我们2月17日的备忘录，后来印发为CD/434号文件，在这方面是很明确的。它包括关于设立各个议程项目的工作机构以及就要求进行有关谈判所建议的职权范围的各项建议。

遗憾的是，在这个议程通过两个月之后，我们仍然还没有能够就防止核战争、核禁试、核裁军及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等优先项目设立附属机构。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机构中这种局面并不新鲜，而且由个别参加国所起的主导作用，几乎没有改变。仍然有几个代表团违背本会议压倒多数的要求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建议，继续阻挠设立具有就上面提到的优先项目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的裁军谈判会议附属机构，而他们企图武断地提出有限的职权范围。现在这种作法很明显是不适合的。

春季会议少有的几个积极标志之一就是设立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其职权范围是“……开始充分而全面的谈判进程，研究并制订出公约……”。至于我们是否已经开始执行这一职权范围，只要看一看已进行的工作，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所有代表团真的积极参加了活动，那么该特设委员会及其三个工作小组本来能取得更多的成就的，但是同时，我们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厄克于斯大使以及三个工作小组的主席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他们已经进一步交换了有益的意见，并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起草工作。在好几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例如，关于未来公约的范围和定义方面。我们还亲眼看到许多代表团表现出了良好的愿望，以及为弥合仍存在的分歧作出了努力。然而，总的说来，这再次证明数量有限的代表团，甚至一个代表团也能够阻挠我们取得实质性进展。可是，请让我提醒尊敬的各位同事，我在4月12日的发言中，对在化学武器委员会内所取得的成绩有更为详细的看法。

因此，现在我愿仅仅在此再次表明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伊斯拉耶利安大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使于2月21日所提出的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储存销毁的重要提案,并没有使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采取类似的行动。美国于4月18日提出的公约草案并没有提出类似的建设性的步骤。另外,这个草案一方面既没有向其他国家的立场靠近一点,另一方面却提出了新的毫无根据的要求,特别是在核查领域之内的要求。

“开放性邀请”概念的提出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一概念显然是许多国家无法接受的。而且毫无疑问地,正是从这点出发而提出的。如果认为各国会认真地准备在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时之后,将其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设施在内的一切军事设施向随便进来寻找“隐藏的”化学武器的国际市场人员开放,这种想法从政治上来说是非常天真的。我们认为这也完全适用于美国自己。

美国的公约草案在某种程度上也赶不上裁军谈判会议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在为“毒性化学品”所下的定义中,使用全世界毒理学者所不知道的“化学作用”这种提法在科学上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前体的定义仅仅同生产有关,而这种生产并不表明它是用作二元或多元武器技术的组成部分。我们还找不到关于关键前体的定义。相反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不完全的,任意列举的关于此种化合物的清单,这些化合物散列在细目A和C中。

开列清单而不提定义,并且只把各种措施列入,这也反映在准许的活动的条款中。这种思想是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在签署这种公约时必须有一项明确的有约束力的界线,而这条界线只能通过有科学根据的,由有限制的但又准确阐述的意向准则所定的定义来划定。

二元化学武器在美国报纸上一向是个忌讳的题目。但是,仍然使人感到惊奇的是甚至在这个全面的公约草案中,这种化学武器也仍然受到忽视。至少在这方面,美国的草案是“始终如一的”。这种情况在细目A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在这个细目中,据说是把最危险的化学品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细目还应包括在美国的草案中没有包括的所有剧毒致死化学品的关键前体。也就是说,这个草案“忘记了”例如那些形成美国化学武库巨大部分的当代毒性最大的剧毒致死性神经毒剂的关键前体,VX,即O-ethyle O-2-diisopropylaminoethyl methylphosphinite。

这个公约草案在另一个方面也是不足的:即它的销毁方法是不分对象不加区别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的，没有为了避免在销毁期间单方面取得军事利益而根据化学武器某一特定部分的危险性，为销毁作出时间安排。

关于陈旧的化学武器，该提案还保留了一些与时代不符合的、毫无道理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不拥有化学武器因而为不拥有销毁设施的小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种国家（将在未来公约的缔约国中占大多数）需要有权向其他缔约国和协商委员会寻求在安全销毁现在很少能找到的陈旧的个别化学武器方面的实际知识和／或援助，而不必因几公斤的毒性物质是否真的销毁了，或者被误认为已转移到并不存在的化学武库中而受到核查。另外，有一些代表团，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对于在初始公布中说明化学武器确切地点的规定表示保留。

如果我们要想在夏季会议期间取得某些实际成果的话，各国代表团应该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相互迁就，寻求互相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并弥合现存的分歧，而不是要扩大这些分歧。

杜贝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您这位我国近邻斯里兰卡的代表担任4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的确是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印度同斯里兰卡有着建立在历史、文化、精神价值以及世俗哲学基础之上的多少世纪的兄弟般的联系。在这个裁军谈判会议中，回顾一下以下这种情况是恰当的。我们两个国家都是阿育王光荣传统的继承者。阿育王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就放弃了用战争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裁减了他的军队并将他的后半生致力于鼓吹和平和非暴力。这样，我们这两个国家，不是在今天，也不是在本世纪，而是在两千年以前就学会了裁军。由于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个职务即将结束，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您所作的不懈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感谢你在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自从本届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方面所表现的出色的外交才干。

我还想向前任主席，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为本会议的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深刻而衷心的感谢。通过他进行的无数次协商，以及他能干地指导了全体会议的审议工作，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促进本会议在各个谈判领域方面取得进展。

今天我打算就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进行发言。在专门讨论裁

(杜贝先生, 印度)

军问题的第一次特别联大上, 就已清楚地看到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危险性。这届会议所产生的最后文件要求为防止此种军备竞赛进行适当地国际谈判。此后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将这个议题的项目纳入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中。在将这个项目列入议程之后的最近两年之中, 尽管各种联大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 希望就这个议题开始谈判, 以便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 但是本机构一直未能就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始任何工作。在这个期间, 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方面的局势, 已经发生了迅速而令人惊骇的变化。在这方面, 发生了对人类命运具有灾难性影响的事态发展。然而, 裁军谈判会议没有能够为即将设立的、讨论这一议题的特设委员会拟定一个职权范围, 因此它仍然处于瘫痪状态。

大约在两千年以前, 在意大利有一个国王。当罗马正处于一片火海之中的时候他却在拉琴。今天, 裁军谈判会议有40名尊敬的代表, 他们代表着各主权政府成员国, 并肩负着也许是当代最重大的责任。正当外层空间即将实现彻底军事化的时候他们却正在为关于这个议题的工作的职权范围而争论不休。然而, 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尽管罗马国王在弹琴, 但罗马城却保存下来了; 而我们这种争辩不休的后果很可能使人类失去存在的最后希望。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地开始了。如果不加制止, 很快就会达到难以应付和难以控制的程度。空间技术的进步从五十年代开始以来, 的确曾为核武器国家提高武器系统的威力, 准确性以及先进性作出了贡献, 而最近几年来就空间技术所引起的可以直接并且明确地加以识别的军事行动已得到了发展。此外, 空间技术日益朝军事方面发展, 导致超级大国对战争机器的研制, 其中包括那些最危险的武器系统, 如热核弹头, 战略和中程导弹、炸弹以及以空间为基地的, 进行全面星际战争的手段。最新进入这一领域的有反卫星武器和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这些最新式的武器已不在局限于科学幻想小说之中; 他们很快就要变成现实。最高一级领导人已宣布打算研制这些武器。为了这些武器的研究和研制已经调拨了大量资金, 数额达几十亿美元。有一个反卫星系统已经部署好, 而为研制一种更为尖端的反卫星系统已经开始进行试验。如果需要证据的话, 为了能够研制这些武器而屡次试图从现有的法律文件中寻找漏洞这一情况就是另外一个证据。另外我们

(杜贝先生，印度)

发现那些把建立在均势理论或威慑理论基础上的核军备竞赛说成有理的语言也已开始运用到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方面。一个超级大国的高级官员最近说，他的政府已决定研制他们自己的反卫星系统，因为对方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竞赛，因此，他的国家必须赶上，使对方不能够单方面控制外层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已经实施的计划将仍然限于研究与研制阶段，那就太天真了。具有军事意义的技术发展本身具有一种势头，一旦武器在技术上达到可行的程度，这种势头就会推动其部署。另外，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不能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以往尖端武器系统研制的经验表明，如果有了政府的赞助这种问题就可以解决；另外还因为政府公开表明，即使没有可能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这些武器仍然是值得研制的。

因此，考察一下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严重后果并向全世界人民解释这些后果，现在并不是为时过早。我打算在以下发言中用大部分时间专门谈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系统的部署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点比较起来并不那么严重，但人们却谈论得很多。这就是它将使威慑理论变成多余的了，并且总的说来，将对国际安全制度造成一种不稳定的影响。我们在座的许多人不会因为这个后果而流泪，因为我们认为核威慑根本不会带来稳定的局面；而且恰恰相反，由于核威慑是核军备竞赛的一个主要的理论根据，因此已经造成了一个极端不稳定的局势。在目前这个不可避免的不稳定的局势中，使用“稳定”这个词真是一种很残酷的玩笑。面对大量的、日益积累的核武器，人们真的能够想到安全和稳定吗？

对于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研制还有一种忧虑，那就是这种研制结果可能使联盟伙伴的安全受到破坏，并且使核武器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的核威慑系统变得陈旧过时，不能发挥作用。还有一种恐惧那就是没有一种反弹道导弹能够保护欧洲——东欧或西欧各国——使之免受用低飞的巡航导弹、近程导弹、空投的或者用作炮弹的战术核武器所进行的核战争造成的灾难。针对这些忧虑，最近几个星期已经作出保证：设计的新武器系统既要能对付洲际导弹，又要能对付可能用于欧洲战场的战术导弹和其他核导弹或常规导弹。

然而，这些武器的研制还有一些人们不常谈到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不扭转目前的这种趋势，不禁止对这些武器的研制，最严重的后果将是“全面的军备”，

(杜贝先生，印度)

最后形成“彻底的”核灾难。有人硬说，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就会使核武器变得无能为力和陈旧过时，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武器系统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危险，其程度超过迄今为止任何武器所造成的。

因为，说这些武器仅仅是防御性的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这些武器既不会永远只是防御性质的，也不能够充分起到防御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到光束武器研制时使用“星际战争”这个词是会使人们危险地误入歧途的。这个词错误地突出了这些武器的异乎寻常的性质，并试图使人们对这些武器的影响产生一种遥远的感觉。事实是，在外层空间所发生的情况同我们在地球上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新式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使用不会在距我们的星球数光年之外引起一场星际战争，而只会在我们这个美妙的地球上引起一场战争。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在外层空间进行的战争演变成地球上的大灾难，也只不过是几个小时的问题。

同时，这些所谓的防御性的武器将会成为进攻性的，或者是第一次打击性的武器。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一事实中清楚地看到：激光和粒子束不仅能够截击并摧毁飞行中的导弹，而且具有将这些导弹摧毁在发射井中的潜在能力。绝对无法保证，这些双重用途的武器将永远只是防御性的。

此外，这些武器系统将为在外层空间和地球上进行的空前的，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打开闸门。一个超级大国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很自然地将会引起另一个超级大国试图同它较量一番。甚至那些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一旦发现他们独立的核威慑已变得陈旧过时，就会单独地或者联合起来搞他们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不顾这要花出多么高的代价。

此外，尽管在这些武器上花费了成千亿的美元，但这些新武器系统并不能够提供充分的保护作用。用意大利的诺贝尔奖金荣获者欧金尼奥·蒙塔莱在一个不同的场合所讲的一句话来说，并不是只有小鱼才可能逃出鱼网。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某些种类的导弹，比如紧贴地面飞行的巡航导弹以及隐形轰炸机是不大可能成为新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目标的。即使按最低的漏过比例来计算，也会有足够的核武器避开反弹道导弹武器而到达其目标，从而使人类文明遭到巨大的毁灭。另外，

(杜贝先生, 印度)

新的系统对于能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反措施说来, 将是不堪一击的。尽管具有这些漏洞, 现在有人正在试图以大儒主义的理论为研制这些武器作如下辩解: 即它将最大程度地破坏另一方的第一次打击能力, 并使另一方在研制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过程中造成难以忍受的财政和物质负担。

另外, 还有一些说服力很强的理由使人相信, 这些新式武器的研制和取得的过程将引起核战争。首先以反卫星系统为例, 摧毁敌方的卫星并不是一个消失在荒凉的外层空间之中的事件, 而将是对另一方的战争机器中最先进组成部分的攻击, 从而十分可能会引起报复。

关于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如一个超级大国已能够部署它的系统, 而另一个超级大国仍然处于追赶的过程, 这就会引起一种危险的局势——这种局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可以设想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 前者可能断定, 通过第一次打击可搞掉对方的导弹力量并且能保护自己的导弹力量不受报复。这样, 新的反弹道导弹技术将使得在这个领域拥有优势的国家比较容易, 比较安全地诉诸核武器。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那个仍未赶上来的超级大国则有可能出于惊慌失措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一旦两个超级大国都部署了他们自己的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就会根本转变整个国际安全局面和国际力量关系。由于武器系统威力和效力的巨大提高而使世界的状况更加恶化, 在这种条件下, 世界将回到五十年代初期的两极时代。如果使世界重新回到这种战略两极状况, 那将会造成如下严重后果: 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霸权大大得到加强; 使所有其它国家在安全方面处于依赖地位; 在局部战场上进行有限的, 或者持久的核战争而不必担心这种战争会危及自己的领土; 甚至鼓励代理国家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以便用于超级大国的战略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裁军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最后, 那种将会导致超级大国或者其他技术上先进的国家研制新式武器系统的基本动机, 以及拥有这些武器系统后会造成的态度, 将违反建立国际经济或政治新秩序这一目标。隐藏在这种军备竞赛背后的总的态度就是不管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获得绝对的力量和控制权。这样一种态度就会妨碍为实现平等, 正义和公正

(杜贝先生, 印度)

所必须的合作精神。这将会改变南北对话以及其他全球谈判的性质。

鉴于这些武器系统对庞大财力方面的巨大影响, 如果竞相研制这些武器系统, 就很可能破坏世界经济的基础。任何种类的武器及其应用的任何方面, 都不会象研制并部署外层空间武器这样消耗财力。据估计, 一个超级大国研制一个完全新式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要花费一千二百亿到五千亿美元。如果大量的财力都被花费在研制新的空间武器系统上, 那么, 当今的世界经济问题将会倍增, 并更加严重。另外, 如果把有技术的人力以及物力转用于这一过程, 就会产生削弱社会和经济部门活动的影响。这样, 很可能使经济复苏过程受挫, 使先进国家的经济继续停滞不前, 或最多也不过是使其在本世纪剩下的年份中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前进状态。研制这些武器对发展中国家已经困难重重的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将是毁灭性的。这样一种惨淡的经济前景就会使研制这些武器所要取得的目的, 即取得绝对控制权和霸权的地位归于无效。

在1984年3月27日《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 法国记者米舍尔·塔蒂引用了主张新的反卫星系统的白宫科学顾问基沃思先生的话: “很难在均势的条件下实现稳定局面”。由此出发就可以说只要再走一小步, 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将可以建立优势。另一方面, 当去年年初美国政府的最高一级领导主张研制新式武器系统时, 苏联的反应(也是最高一级领导的)就是: “想取得对苏联的军事优势的一切企图都是徒劳的。苏联永远不会让它们得逞”。这种情况的真正结果将是, 如同核武器军备竞赛的情况一样, 既无优势也无均势, 而是使外层空间和地球上的军备竞赛上升到新的一级, 结果产生我刚才试图勾划出的严重后果。

本会议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这些武器是可以加以核查的吗? 如果不是, 禁止这些武器是否可行? 关于这些武器的控制和消除是否可以加以核查的问题, 专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例如,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在其1983年11月的报告中指出, “苏联反卫星系统的进一步部署和试验很易于核查, 如果说存在核查问题的话, 那是指对远为先进的美国系统有这个问题”。另一方面, 有些专家则说, 较为先进的美国系统更易于核查。还有一些专家认为, 如果全面禁止, 包括禁止反卫星系统的研制, 当然会出现核查问题。但是此种禁止不是关键性的。对试验及部署的禁止确实是可以加以监测的, 并将会实现防止这些武器的进一步研制和扩散的

(杜贝先生, 印度)

这个关键目标。

不管怎么说, 从军事技术, 包括外层空间武器系统的军事技术正在发展的方式来看, 多数新式武器系统迟早会变得无法核查的。按照一类专家的观点, 新的武器将以一种微型化到一定程度的工业为基础, 从而使这些武器无从核查。研制可以逃过核查的武器系统, 现在已经成为那些进行军事竞赛国家的一个主要要求。这些国家错误地认为通过军备竞赛这一手段可以取得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难道只是因为这样一些办法无法核查, 就不会有军备限制或裁军吗? 我国代表团认为, 那将只能说明, 这种绝对强调核查的说法一直是多么错误, 这曾被用作为一种托词, 不进行关于停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以及现在的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认真而真诚的谈判。

如果我们考虑到最近事态发展的一切后果, 那么, 结论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 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了。如果我们能够紧急地谈判出一项或多项协定, 我们将会制止住那种将会把我们带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的最新一轮未来型武器的扩充。我们不应被这种说法引入歧途: 即由于新的武器系统仍处在研制和研究阶段, 所以不用着急。正是因为是处在这个阶段, 我们才有可能禁止这一新的军备竞赛。如果我们错过这一机会, 这种武器有朝一日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另一个可怕现实, 并有可能与整个武器系统以及拥有此种武器国家的安全理论结合在一起, 以致使关于对这种武器的控制或禁止的谈判就象关于核裁军的谈判一样难以进行并受挫。事实上, 在某些方面, 特别是反卫星系统的情况, 看起来已经到达这种令人失望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能沉溺于那种为关于这一议题的特设委员会规定一个不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的想法呢? 老实说, 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建议我们应满足于对可能产生不稳定作用的空间武器系统或者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关的各种问题仅仅进行识别; 或者满足于分析那些对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影响的现有国际协定的漏洞; 或者满足于采取一种首先从卫星不受攻击问题入手, 然后再来处理新武器系统这样的逐步解决办法? 后一个建议在六十年代初提出时, 本来会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不行了。至于我们把对现有有关国际条约进行分析作为出发点, 这种做法几年前可能有点价值, 但在今天就不行了。现在我们都知道, 尽管有这些条约仍然正在研制和试验新的武器系统。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扭转这一趋势。

(杜贝先生, 印度)

目前存在着就这一议题开始认真谈判的一切条件。首先, 我们面临着最近事态发展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尽管存在现有的法律制度, 而且正是由于违反了这些制度, 这些事态发展还是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新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还有, 苏联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一议题的条约草案。事实上, 每一个对这一条约草案发表意见的代表团都使我们注意到这一草案的积极特点以及它同苏联于198年就同一议题提出的提案相比有了巨大的改进这一情况。该条约关于不但禁止部署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 而且禁止此种武器的试验和研制; 禁止新的反卫星系统并销毁现有的此种系统及其核查等的条款是特别值得欢迎的特点。有人对该条约的核查条款是否恰当提出了一些疑问。在这一方面, 我们得到了苏联代表团团长的保证: 这些条款是可以谈判的, 以便详细拟订和修改。法律文件的草案, 不只是供在本会议的全体会议的发言中作一般性评论的; 提出该文件的总的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作为认真谈判的基础。

自外空时代开始以来, 我们曾有多次机会为人类在征服外层空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在这方面, 我们同有关国家的国民一样, 在美国航天飞机、苏联的礼炮号和联盟号以及欧洲外空机构的阿丽雅娜号每次成功地完成其使命时, 我们也感到很兴奋, 好象这也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最近, 通过电视网, 我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了为庆祝两位苏联宇航员和第一个印度宇航员、拉凯什·沙尔马在外层空间取得成就的活动。

因此, 我们只要一想到人类的伟大冒险活动正在转用于破坏目的, 有可能引起核灾难, 就会不寒而栗, 更不用说要接受这个事实了。我们全力以赴并一心一意地敦促, 必须制止这一趋势, 防止研制这些外层空间武器。我们必须毫不迟延地开始谈判, 以制订一项或多项新的文件。这种必要性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幸运的是, 空间技术尚未沾上广岛式的耻辱, 世界人民仍珍视尤里·加加林的第一次空间探索和尼尔·阿姆斯特朗为人类的作出的那个巨大的飞跃。通过制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我们将不仅能够把人类从灾难的边缘最少向后拉回几寸, 而且, 将会为裁军, 为人类继续探索外层空间的和平用途的潜力作出贡献。

(主席，斯里兰卡)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而且我想向这位我国的友好邻邦，同时又不是结盟运动主席的国家代表表示我对他真挚由衷的谢意，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要求发言是着重强调，加拿大政府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某些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是紧迫和重要的。我还要在发言中对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进行一番分析。

在此之前，我要和其他人一道，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务。加拿大同斯里兰卡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而又富于成果，这一交往由于英联邦的关系而更为密切，这种交往还可追溯到起源于科伦坡计划以前很久的时候；而且事实上，我们共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观点在不久前，即去年在果阿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就公开宣布了。

我们认为，要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程序问题同主席进行协商这一方法一直是受到欢迎的而且也是颇有效果的。您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主动精神及果断的处理问题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特别有价值的。

对某些我们认为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们建议既要谈实质，又要谈程序。

总的说来，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今年人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并未取得更多的进展，即使在程序问题上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严肃地提出问题，我们能否象对待新项目似的年复一年地象现在这样坚持审议是否有必要设立裁军谈判会议各附属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职权范围等问题呢？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花费的时间与取得的成果不相称，而且确实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本来不必要花这么多时间。我们完全支持在为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而正在作的努力。话虽这样说，但进程与进展不应混淆。

我们认为，如果重申各国政府有必要用具体方式来实现它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经常唱的高调，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种必要性很明显，并且也已讲过多次。本机构如要维持信誉，就必需在各国首都作出决定以后，开始实现众多的人们一直

(比克利先生，加拿大)

在要求的进展，而且这种进展也明显地是为维护并加强共同安全所必需的。

裁军谈判会议上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进程显然有所发展，趋于成熟，并且取得了对当年来说令人高兴的结果。某些人甚至很乐观地指出，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可在1984年会议上运用到人们最为关心的其他方面中去。

但是，我必须承认，即使确实如此，也不是立即可以看得见的。人们对这一进程的印象是，我毫不怀疑是公众的印象，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把我们有限的力量分得很散再来解决增加得很快的一大堆问题，而且其中许多问题对当前的重大议题并不重要。人们并不是没有在本机构作出承诺，也确实不乏全世界都深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有关我们时代的那些最为复杂、最为紧迫、也最为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实际进展。

但是我们认为，要批评裁军谈判会议，把没有进展的责任归咎于它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公正的。归根结底，本会议所遇到的困难几乎总反映出对安全概念的极大关注，而这些困难只能在各国首都得到解决。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缺少的是就全世界见多识广的公众舆论要求对其迅速采取行动的那些问题进行严肃批判的意愿。

现在我要转而谈一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中的三个问题。我建议在夏季会议期间把主要的力量集中在这些问题上。这三个问题就是：一项化学武器条约、核禁试条约及外层空间。我还要简单地述及放射性武器的问题。

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在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本会议所有成员对此都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向会议提交了作为我们谈判基础的200多份工作文件，其次是有了谈判进程从而在去年夏季产生了获得一致通过的报告（CD/416）。今年年初以来，由于若干重要的事态发展，这种势头得以保持了。当然，至少还有1972年提出的三份条约草案，还有20多份工作文件（包括加拿大提出的四份）。这些文件都是与一项公约的具体方面有关的。不过，美国于1984年4月18日提交的条约草案当然是最全面和最详细的条约草案，如果这一条约明天就能生效，那么它实际上可以确保世界上在10年内没有化学武器。

许多人对美国和苏联最近在化学武器领域里采取的主动行动作了评论。我们认为，这反映出大家都希望进行严肃的谈判，以便取得具体的成果。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本届会议之初，我们在2月21日的发言中曾对苏联关于对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行现场视察的提案，表示过欢迎。当时，紧接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之后，我们就说，苏联这一主动行动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极为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这表明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当时还说，希望苏联的这一提案有比较广泛的含义。我们要再次声明，对苏联的这一提案，我们感到满意；我们确信，它将和美国最近提交的禁止化学武器草案一样，都有助于促进我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谈判。

在化学武器的问题上，有件令人不快的事，这就是在许多情况下，限制使用化学武器的动机是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是出于法律的考虑。不管人们对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法律原则的普遍性采取何种法律立场，我们必须这样设想，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保有、转让及使用化学武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已有足够的一致意见，因而有达成协议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同样我们认为必须接受下述原则，即除非有足够的保证，能够保证对各缔约国遵守公约条款的情况进行核查，否则各国就不敢放弃自己的威慑力量。

许多人仍在研究美国副总统布什上周提出的美国条约草案，还有许多人在等待苏联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行现场视察的立场的进一步阐述。现在要检验的是这两份互相关联的提案是否能对我们正在力求实现的关键性协定进行谈判，而且我们认为，还要使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协定——起必要的动力的作用。

正如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提案是最全面的，同时毫不奇怪，它也是最为详细的。同苏联的办法一样，它也标志着在我们都希望走的道路上迈出的大胆的一步。就美国提案而言，我们应该承认，这一主动行动是一个超级大国为实现化学武器裁军而作出的一次真诚的尝试。不管人们对具体条款的反应如何，必须承认，这一条约草案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态发展。虽然有些条款，特别是条约的遵守方面的条款，可被认为是严厉的，但是这些条款却是对双方都适用的，甚至可对各方都适用的。美国把这些条款列入草案就等于事先表明它愿意遵守这些条款。我们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谈判条约措词时，一开始就应承认，如果不实行有效核查，那么另一选择要么是完全信任，要么就是继续依赖一个国家自身的能力；完全信任或许很理想，但是遗憾的是它并不现实；继续依赖自身的能力则与上述理想相反，它显然是不可取的。显而易见，只有非常严格的核查措施才能促使各国信赖条约的条款，并把其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国家的安全寄希望于这些条款，不去采取自助的办法。这显然不言而喻，然而还是值得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的。就代替那个有各种恶劣作用的自助办法而言，严格的核查条款可能不仅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而且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美国的倡议旨在用条约保障措施来取代威慑性的化学武器储存，因此它对我们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这一共同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加拿大长期以来追求的具有头等重要的目标。我们保证愿意——也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积极贡献力量，我们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襟怀坦白，并本着合作的精神来探讨这一提案。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代表我们各自的政府，另外还有一种更广义的身份，即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如果遇到问题，就应提出可供选择的实际建议来解决。

在我们看来，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化学武器公约的目的可以是双重的，如果能顺利谈判，并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在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它将规定和控制禁止的执行，从而对相互安全作出贡献。但是同等重要的是，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能在横向的意义上对上述纵向的意义加以补充：它将在现在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间规定并控制禁止的执行。就是把不扩散作为一项根本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项条约才能真正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其有效性甚至其普遍性的程度是可以与它能否有效执行相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过了。

还有另一项潜在的具有深远重要性的考虑：虽然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进程本身就很重要，但是它却可能远远超越化学武器而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就连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也表明，相互安全及为确保这一安全所必需采取的办法不是使一方或多方的安全加强而使对方安全下降的简单进程的产物。确实很明显，通过顺利的谈判，达成一项可为普遍接受的禁止扩散化学武器的公约将会有利于各方的安全。

当然，除了实际的技术及程序方面外，在政治上，甚至法律上都存在着困难。各国政府在有关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上，对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均有各自的见解，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在谈判的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利益，以便制定一项文件，使之体现出就我们的根本目标所达成的协议中最大的共同特性。如果要使谈判进程起动，就必须坦率地正视刚才提到的这些困难问题，而且我建议，不要去求助于唇枪舌剑，也不要对彼此的动机提出怀疑。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现实说明应该强调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本会议未把这些悲剧性的事件纳入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只是不断用它们提醒人们认识我们工作的紧迫性，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在结束我们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详述前我要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确切地证明，只要对解决程序问题有共同愿望——在现在的情况下要有共同决心，那么我们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当然我们感到满意的是，程序问题已得到解决，1月16日到2月6日期间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也在本届会议上协商一致地通过了。但是我们并未忘记下述事实，尽管这份报告中建议立即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举行谈判，但是程序方面的困难又一次阻挠了本机构立即开始举行谈判。鉴于已经有了一份经过精心谈判和事先商定的文件，并且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程序困难迟迟不解决，因此出现了程序方面的困难就特别令人遗憾，而且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有关的人是一个教训，要求我们维护本论坛的有效性和声誉。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象我上面曾提到的我们是以代表的资格来到这里的，还因为我们都对我们各自国家的公众负有责任，当然，负责的程度是不同的。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对世界公众舆论共同负有责任，我们最好记住这一点，并确保本论坛不被滥用。

我想借此机会，推选厄克于斯大使为“会议服务员”的典范。他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向我们表明只要有耐心和韧性，再加上关心和承诺就能够面对一系列程序性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有些则是新的——推动我们的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够恢复我们认为不一定打断的工作，应归功于他，还归功于在他领导下的工作小组协调员，荷兰的阿克尔曼先生，巴西的杜亚尔特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蒂利克先生。事实上，厄克于斯大使如他的前任，麦克费尔一样向我们表明，当我们有了充分的动力之后，我们就能够在程序性的迷宫里找到出路。

我还要提一下，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厄克于斯大使要求加拿大以他的名义进行协商，以便确定如何最好地将使用的问题纳入公约的范围。我们自己则将客观地、公正地进行这些协商，以便取得大家都认为最好的结果。

(比斯利先生, 加拿大)

现在我来谈一谈全面核禁试问题。我没有必要提请会议注意, 核禁试条约是特鲁多总理在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窒息战略的四个基本要素之一。核禁试仍然是加拿大政府的根本性目标。正如总理当时所指出, 只有那些进行这种试验的国家达成共同协议, 这种禁止才可能得到执行。不幸的是, 在当前条件下, 指望单方面接受全面禁试是不现实的。

对于本会议来说, 核禁试有两个方面必须加以处理。一个方面是程序性的, 即有必要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这是在此出席会议的成员国的责任。二十多年来, 核禁试的目标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目标——至少我认为是大家的目标。事实上, 过去二十年来执行的, 或者说至少是得到遵守的两项条约: 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和197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使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段。今年2月9日, 特鲁多总理在加拿大众议院指出, 如果美国和苏联批准后一个条约, 这将具有实际的和象征性的作用。它可以驱散似乎继续阻碍着谈判进程的疑云。当然, 停止一切试验本来是谈判的目标, 后来这谈判导致了1963年的条约。值得回顾的是, 美国总统在1976年把级限禁试说成是“部分禁试之后的一个很不充分的步骤”。因此, 他主张举行三边会谈, 以便在1977年实现全面禁试。对遵守进行核查的能力成了争议的中心, 因而这些会谈于1980年令人遗憾地中止了。

这些会谈中的争议传给了本会议。实现核禁试依然是本会议的一个遥远的, 或者说并不遥远的目标。从加拿大的观点来看, 作为一个紧迫事项, 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以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为这目标而努力。同时, 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也必须承认, 除非遵守的实际核查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否则不可能取得大的进展。我们应尽快设立这个机构, 以便使我们能够明确我们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 从本会议的立场出发, 对于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重要性以及它继续工作的方案, 怎么强调都不会过份。我们打算更多地支持该特设小组的活动, 并期待参加1984年秋季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实验。正是此种实际表演活动的发展将为本会议的政治和外交工作提供关键的资料, 以实现全球核禁试, 从而制止武器的发展。

我们认为, 我们就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进行的辩论很简单化, 简直有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些做作。有人说，按目前的职权范围，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完：而另外的人却坚持认为，除非赋予该委员会一个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否则在核禁试方面，就不能取得进展。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表明实质性进展是可以取得的协议的确是有可能达成的，而这个小组自己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工作的。难道我们因为有分歧——例如，在将“谈判”这个词纳入职权范围方面存在分歧——就只能继续停滞不前，甚至往后倒退吗？难道不对任何参加国的立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表示的立场——采取粗暴态度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工作吗？

如果我们把我们在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看作是一个有益的实例——一个先例，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称它的话——我们本来能够根据一个不包括“谈判”这个词的职权范围做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后制定出一个协商一致的文件。请不要误解。我们是能够接受一个关于核禁试的“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的。事实上，我们是大力支持这一职权范围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否值得优先于这一类的任何有益的工作呢？

这种僵局是符合那些不希望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的人的要求的，我相信这里没有这种人。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有破坏裁军谈判会议的声誉——并从而破坏有效性——的危险。

我们支持逐步解决的办法：让我们首先就职权范围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认为，然后应争取在一个领域尽快达成共同谅解，这个领域可能是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先决条件，即一个协定的核查方式；然后迅速转向另一个领域。很明显，谈判必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这是加拿大的立场——但是能够而且应该首先为具体谈判打下必要的基础。

现在我必须谈一个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份的问题。我指的是军备控制的外层空间的问题。

我们相当忧虑和遗憾地看到裁军谈判会议显然无力解决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非常实际而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严重的不稳定作用，更不必说可能要消耗几乎不可想象的大笔财政支出。我们认为，如果试图追究这个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的责任，那将是徒劳的。实际情况是，去年没有设立特设工作小组，而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又尚未就设立附属机构达成协议。我要建议，正如我们对待核禁试这目标的情况中一样，我们应利用在其他谈判领域所取得的经验来认识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我们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正面临一个几乎是独特的情况：即本会议有了一个处理新的，实质性的，至关重要问题的机会——而且是一种挑战。不管商定的职权范围多宽，起码可以说，肯定谁都不会否认，进行某些基本的研究，还是必要的。可以设想，必要的第一步就是对有关这一议题的现有条约及国际法进行调查。这个设想并非没有道理。同样定义方面的问题也是必须从一开始就着手解决的基本而重要的内容。

因此，我认为我们能够，并且应该，立即就特设委员会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以便对外层空间问题这些方面以及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对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进行讨论。如果说过去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具有此种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在剩下的夏季会议期间会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无论如何，一旦成功地，我们希望，迅速地制定了这个初步的职权范围，那么，本会议就能够转入这个问题的其他更为详细的方面。

为了避免有人对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所疑问，我要提醒本会议，特鲁多总理在1982年6月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曾敦促国际社会就禁止用于外层空间的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这仍然是加拿大最重要的一个军备控制目标。事实上，加拿大是1982年在本会议第一批就这个议题提出实质性工作文件的代表团之一。我们提出的文件论述了空间各系统对局势可起稳定作用和不稳定作用的特点。那时，我们的要旨就是，在处理外层空间问题时，有必要慎重考虑每个系统全面的主要作用。例如，侦察卫星的军备控制方面的作用很可能比其寻的能力重要得多。

然而，此后，总理1984年2月9日在众议院说，他打算在裁军谈判会议散发一份关于禁止高轨道反卫星系统的提案。加拿大政府现已开展了关于外层空间问题某些方面的几项长期研究。我们打算利用研究的结果，以创新的方式，为拟议中的特设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作出贡献。我们建议既要从整体上，又要从有关低轨道和高轨道的各个具体方面来处理外层空间。我们认为，对低轨道和高轨道的区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特鲁多总理去年11月在蒙特利尔关于反卫星的一次讲话中就提请注意这一问题。我们打算在适当阶段提出几个工作文件，更加详细地讨论解决办法，特别是关于对高轨道的解决办法。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现在我打算简单谈谈放射性武器问题。这个早就似乎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恰又似乎是我们奇怪地缺乏想象力和承诺的一个问题。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历届主席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说是异常巨大的，这里我特别要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为例。去年，苏联和美国都担任接触小组的主席。这些小组曾试图达成一致，但最终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我建议我们都应审查自己的立场，目标是在夏季会议期间达成协议，并通过一个条约草案，让我们考虑一下各种可能性吧。第一，这是苏联和美国意见一致的领域，这在它们 1979 年提出的提案中已得到了证明。这本身对本会议来说就是一个重要事实。第二，这一条约草案将会使武器系统得以研制和部署之前就将其有效地加以禁止。事实上，这将排除对此种系统的研究和研制。最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将会在心理上给国际社会一种鼓舞。从各方面来说，国际社会不仅需要，而且应该得到这一鼓舞。我们可以在人们迫切需要的方面，并在可对其他问题带来教益的、着眼于未来的问题上提供希望的信息。

我们意识到，有人深信 1979 年的共同条约应涉及其他方面。我们并非不同意那些认为其他问题也应得到处理的意见，但我们建议，这些问题可在以后的谈判中加以处理。加拿大代表团赞成对直接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问题进行审查，其目的是简化谈判过程。事实上，我们可以同意达成一项以 1979 年提交的原件为基础的草案。这样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问题竟然仍未得到解决，这在事实上对我们——我们认为对本会议——是令人十分难堪的。如果我们能够就一项条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将放射性武器问题从议程上删掉，那么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这将反过来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实质性问题。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请本会议注意，加拿大政府上周向议会提出一个关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由公众提供资金的“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该研究所有双重目的。第一，它将增强对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了解，特别以防务、军备控制和裁军等问题为重点，办法是收集和传播有关这些内容的情报和设想。第二，它将鼓励公众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讨论。这将通过设立奖学金以鼓励研究工作，并为研究筹集资金，以及通过在加拿大各地组织或举行会议式讨论会等方式来进行。

加拿大政府的意图是，该研究所将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并且将根据它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地从事研究，情报搜集和传播以及出版。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世界一级的机构，为加深和扩大加拿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作出重大贡献，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我们在国际一级为解决军备控制和裁军这些重大问题作出贡献的能力。

最后，我想进一步简单地谈谈公众对本会议的一些看法及本会议在为公约进行谈判方面的能力。我认为我们都会同意，国际社会有权期望一个毕竟称为“裁军谈判会议”的讲坛在紧迫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不管责任在于各国政府还是在于与会的各国代表，其中包括我们自己，或两者兼而有之，很遗憾，没有什么成就可以显示我们在春季会议所做的辛勤工作。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更好地利用夏季会议，以便我们可以向世界人民证明取得了具体进展。世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这种希望要比我们迄今所做出的成就大得多。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托瓦尔多约大使发言。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由于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极其出色地履行了本月，也是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务。看到您——一个与印度尼西亚保持最良好关系的同是亚洲国家的尊敬代表担任主席职务，我同代表团感到十分满意。

本代表团将一如既往，继续全心全意支持主席的工作，并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为您尊敬的前任，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及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在前两个月中出色地履行了他们艰巨的任务表示由衷的赞赏，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请允许我作为一个新来参加会议的成员感谢各位尊敬的代表，包括主席您本人作为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早些时候的发言中对我和其他新成员所表示的热烈欢迎。我要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继续同他们尽可能保持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度尼西亚)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贾帕尔大使、副秘书长及秘书处的其他成员对我本人及我国代表团成员表示的友好态度和给以持续不断的支持。

我个人认为，参加这一关于裁军问题的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机构确实是一种荣誉和极大的荣幸，这一机构的成员中有许多杰出人物。我必须承认，我在离开祖国前来日内瓦的时候并不是一点都不紧张的。

话虽这样说，如果我立即又和本会议大厅内外的人们一道，因我们迄今为止集体进行的工作进展甚微，或者没有实质性进展，而表示遗憾，并提出指责的话，我希望不要认为我无礼或怀疑别人无善意。

在我以前的发言人已对本届会议以及在谈判会议被称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期间所取得的以及尚未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分析。不能否认，从任何标准来看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真是小得令人伤心。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那种认为裁军谈判，包括我们在这里进行的审议，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或者至多也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的失败主义的观点吗？有些发言者已经对我们分析了形势，或者阐述了裁军谈判赖以根据的哲理。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谁应该受到责备，为什么不能有所期望，为什么不应该坚持这一种或那一种方针或者我们应怎样做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主席先生，如果您征询我的意见，我应该说，根据我简单的头脑和现在又搞得稀里糊涂的情况下，我倾向于同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意见，如果不是所有意见的话。我必须承认，我之所以倾向于同意他们的意见是因为在他们陈述的道理中，我难以找到任何毛病。可以这样说，他们提出的合理的意见是无懈可击的。

然而，如果我按这样办，从而采取一种立场，其结果使人们同意或听任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特别是21国集团看来是我们议程上应优先考虑的大多数问题按兵不动，那么我的良心将会受到责备，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认为既支持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又支持指导我们工作的各项联大决议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错了。

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必须告诫人们，不要“纯理论”或者你可以说“高度纯理论”。我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态度，即把合乎理性的东西，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鉴于人们的才能有限，那些在某个时候例如包括目前，看来好象是合理的东西，视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印度尼西亚)

作最后真理，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屑一顾。

也许我引用一下我国古代一篇名著能讲清我的意思。随便一件什么事。例如我们在做一件使别人感到不安的事，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尽管他们想向我们说明的意思在事实上是一样的。一个有学识的人也许会走来对我们说，我们做的事是错的。他甚至还会告诉我们为什么错。一个学识较差的人也许只是叫我们不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而另一个学识更差的人可能会因之而生气，并对我们大加指责。

这三个人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想告诉我们的却是相同的事。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怎样作出反应。按照古人的教诲，一个聪明人不会因第三个人生气而生气，不会对第二个人不予理会，也不会不注意第一个人的话。不管别人怎样对待他，他都以同样的态度对问题的实质作出了反应。他做人们合理地希望他做的事，就是停止做他正在做的事。

关于这篇东方名著就讲这么多。我想说明的问题是，不能把我们成员中某些人对某些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或经验作为其他成员使讨论进行不下去，或根本阻挠就那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的充分理由。

我国代表团认为，同有人在这个大厅里暗示的情况相反，学习的进程——如果任何时候会涉及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同时是讨论和谈判的进程。这一观点当然预示着准备获得必要的知识。这样去参加讨论和谈判，即使知道的不多，至少可以思考问题，当然还要怀着能发挥建设性作用好最良的意愿。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力图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人们应敞开心扉。大家必须随时准备尽力去了解别人的观点，看到他们论点中的可取之处，并在随后发生的事情或人的理解力有了新的发展之后，证明另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依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要想讨论取得成果，必要的先决条件是敞开心扉、态度现实而又富于理想。根据目前我们讨论的情况，以及裁军谈判总的情况来看，我应该说，现阶段特别需要的是：应该有很多理想。我的态度还是很现实的，不会指望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劝导，按照另一篇东方名著的精神去办事。这一篇说的是，作出自我牺牲的事便能掌握真理。

但是在这方面我不仅想起了和平示威者多年来常用的那句口号，它呼吁“给和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印度尼西亚)

平一次机会”, 其意思是为了确保持久的和平, 人们应该作出一些从形式上看好象“不太安全”的“牺牲”。我想, 这同一精神一定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联合王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有过一些启示。他1959年在评论尚未完成的全面禁试条约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为了得到一样极好的东西, 我们应该承担一些风险”。

正如有人在这个大厅里指出的, 虽然现在还有机会阻止世界毫不留情地滑向大屠杀, 但是这一机会也许是最后一次, 现在如果不抓住它, 这个机会便一去不复返。鉴于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 难道象这样“冒点风险”的作法终究不能证明是现实而合乎理性的吗?

关于议程项目, 我不准备在会议上重申我国代表团已广为人知的立场。我只要这样说就行了: 我国代表团关于那8个议程项目的立场, 如我的前任去年在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 没有任何变化。此外, 关于全面禁试、防止核战争和有关事项,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等问题, 21国集团的其他发言者已经阐述了我们的共同观点。他们的发言非常有说服力, 而且透彻, 是非我所能得到的。21国集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由集团发言人阐明的其它项目, 包括要求设立必须赋予适当职权范围的有关的特设委员会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

我国代表团欢迎特设地震专家小组的第三份报告, 并感谢该小组的成员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希望该小组的工作将促使本会议更接近于开始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实际的工作。

关于化学武器的问题, 我要略为谈几句。首先我要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的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那为人表率的精神及他为筹划化学武器谈判的工作结构所作的不懈努力, 表示由衷的赞赏。

今年2月,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宣布, 苏联为了核查目的愿意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过程中在专门设施常驻国际监督代表的立场。对此我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同样我国代表团也欢迎美国副总统今年4月18日提交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重要的事态发展将促进本会议的工作, 从而使我们很快有一份能为各方接受的商定的文本。我们今天上午听到了伊朗副外长的发言, 这使我们又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印度尼西亚)

我国代表团愿意在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但是我要重申，如果这样作事实上会影响我国代表团认为应优先考虑的那些议程项目的重要性，我国代表便不打算这样做。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及他致主席本人的友好言词。

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布特勒大使发言。

布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今天有一些代表团的发言是评论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确实，尊敬的苏联代表提出了他称之为该代表团对形势的“评价”现在我无意作这样的“评价”，但是我国代表团确实希望在这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谈谈我们对面临的问题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某些看法。

在英语中有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隐喻，说一个战胜了几乎是无法摆脱的困难的人是“从失败的嘴里夺来了胜利”。

我国代表团认为，不能这样来描述我们过去三个月的工作。确实，我们担心，如果说我们的工作费力不讨好，到头来我们可能从胜利的嘴里夺来了失败，作这样的形容可能更恰当些。

澳大利亚十分珍视自己裁军谈判会议成员资格。作为这样的成员，我们才有机会参加今天国际政治议程上各项至关重要问题的讨论和谈判，并能投身于为迎接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结束军备竞赛，并通过军备控制确保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行动。

这一工作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相信是所有克尽职守的政府都向其人民许下的基本诺言，这一诺言即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的中心内容：所有人民都有权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准，都有权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之中。

就其产生的源由和职权范围来说，我们的会议都是独特的。它有两项职责，即就裁军问题谈判达成协议，并为确实构成和平局面的各项重要问题进行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多边讲坛。在目前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这后一项讨论更为重要，因为缓和这一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就导致这一紧张局势的问题和引起关注的事进行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讨论。这必须导致进行谈判的实际步骤。谈判是我们使采取的行动更实际的办法。这正是我们的职权范围所要求我们作的。

我今年2月14日以我国政府名义在本会议作的第一次发言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谈判进程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吗？”今天我要重复这一问题——有什么可怕的？

澳大利亚关于谈判的观点同曾被说成是列宁关于这问题的观点有所不同，列宁说的是“当根本利益处于危险的时候，千万不要进行谈判。”我们大家的根本利益在本会议议程的各议题中都受到牵连，对此谁能怀疑呢？正因为我们的根本利益危若累卵，我们才必须进行谈判。澳大利亚关于谈判的观点是，谈判是这样一个过程，人们首先对那些根本利益的实质加以探讨和确定，然后使人们实现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这些目标中最大的一个当然是削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根除那些今天如此可怕地在威胁我们的军备。按照这些目的进行谈判，不会威胁到任何人。如果最后证明用某种特殊方法去解决一个军备控制的问题不甚有效，或不起作用，那么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谈判也是有成果的，因为这会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开始采取另一种办法，必须是更有创造性的办法。

如果反过来谈判成功了，就是说，如果通过采取一个既可为大家接受，又不危及安全的方法实现了军备控制的目的，那么下一个步骤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即通过并执行这样一项协议。

今天有若干发言者试图把过去三个月来工作没有进展的责任归咎于某些代表团。我国代表团认为，责怪别人是很令人遗憾的。把责任归咎于别人有什么用呢？难道对别人的中伤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大家都在寻求的协商一致的意见吗？难道会使谈判增加一种更好的气氛吗？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这些答案。这是一种消极而富于破坏性的行为，因此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更糟糕的是，有人有时候置事实于不顾，偏偏采取这种行动。今天上午有个代表团（恕我不言其名）在这里说，在核禁试问题上没有进展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某一个代表团，和这个代表团所属的那个集团。所提出的这一指责，完全不合乎事实。此外，它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提出这种指

责的那个代表团所属的国家集团正在阻挠关于外层空间职权范围问题的进展。

提出这些论断是徒劳无益的。它们反而妨碍实现核禁试, 对我们毫无帮助。如果这些论断实际上以歪曲事实为依据, 那么它们的危害性就更大。

我想说明的是, 我国代表团奉命尽其所能缩小会影响我们进行实质性工作的, 关于程序和形式方面的争论, 即关于条例而不是实质的争论的程度。本会议在最初两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它通过了议事日程和工作计划, 但是那个工作计划却几乎还没有开始执行, 因为我们老是在围绕我们赖以进行工作的程序性条目进行辩论。澳大利亚对此种局面深感遗憾。我们并不那么天真, 以至于看不到关于程序和形式方面的争论常常掩盖真正的实质性问题。但是必须做些配合工作。

正如我们加拿大同行几分钟前指出的那样, 某些代表团好象更关心的是确定职权范围草案中某个词而不是处理手头的工作。可是这些代表团事实上常常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个词如此重要, 也不能说明, 如果可以找到其它有关职权范围的可以折衷的措词, 为什么工作就不能以某种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下去。

不久我们将休会, 在休会期间, 我们都必须积极努力, 以便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程序问题, 从而使我们能够在夏季会议一开始就能立即开始进行整个议事日程中的实际工作。

在今天即将结束的这次会议期间, 有一个明显积极的事态发展, 这就是美国政府向本会议提交了一份化学武器条约草案。在这项条约提交给本会议的那天我曾代表本国政府作了发言, 我说美国政府已向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 我们不应失掉这个机会, 如失掉了是不能得到宽恕的这仍然是我国政府的观点。

我们断然拒绝接受某些人今天在这里提出的下述论断, 认为美国政府的行动在某些方面是不真诚的, 其草案的措词表明它并非认真要通过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我们认为美国的行动是诚意的, 澳大利亚准备积极参加为达成一项有效的化学武器条约而进行的谈判, 我们认为参加本会议的其他代表团大多数也都会这样做。

我们最为关注的是本会议在目前会议期间未能就一项全面的核禁试条约开展工作。这一个工作之所以未能开始正是我提到过的那些形式方面的争论中的一项造成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的。确实，这种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决不能忽视，在全面核禁试条约这个问题及不扩散条约的审查进程方面所要求的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而重要的关系。

我认为，一个人总应做他为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理由而做的事，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正确的原则。我认为，从我们得到的任何特定的一组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是重要的。我想起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科学家想研究普通苍蝇的特性。作为这项研究的一个内容，他首先训练苍蝇跳越过一支铅笔。后来他想知道假使摘掉苍蝇的一条腿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只苍蝇还能不能在他的指挥下按照他科学地教它的办法跳越过一支铅笔呢？于是他摘掉了它的一条腿，又教它跳越过那支铅笔，这只苍蝇也设法跳越过去了。他又接着作试验，一条一条地摘掉苍蝇的腿，在每条腿被摘掉后，那只苍蝇还能跳越过铅笔去。现在剩下最后一条腿了，他又把它摘掉，然后指挥苍蝇从铅笔上跳越过去。苍蝇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科学家这才不得不作出结论。根据一种引人注意的逻辑，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摘掉一只苍蝇所有的腿，那它就不听指挥了。

我们必须从我们所面临的局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我们应运用比那个科学家高出一筹的逻辑。我国政府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认为我们会议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是表明我们没有负责进行有关裁军措施的谈判。我冒险把我的故事引伸得过远了些，我们谁也不愿意进行牵子的对话。

我曾说过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它在这一会议上的成员资格，这当然是真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把军备控制和裁军列为非常优先考虑的问题。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得到澳大利亚人民的大力支持。

4月15日星期天，澳大利亚全国有25万以上的人自愿参加了公众集会，即每32个澳大利亚选民中就有一人参加。这些公众会议和集会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在这张会议桌上派有代表的所有国家及许多虽然没有代表，但在某种意义上由我们代表的国家，也正是有这同一种精神和同一个愿望。我们决不应使这些人民失望。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举行谈判，我们必须在6月12日怀着明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确而重定的目标回到这里开始进行谈判。

梅斯特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在春季会期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我请求发言是为了提交CD/501号文件。这一文件载有华沙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公报，如你所知，这次会议是于1984年4月19日至20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在会议期间我们注意到，由于在某些北约国家已开始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从而使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核军备竞赛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特别危险的阶段，本已紧张的局势变得更加尖锐了。正在进行的核军备竞赛逐步升级的结果是，对人类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核战争威胁大大加剧了。

会议强调指出，华沙条约缔约国确信，要使局势得到改善并恢复缓和就必须在各国之间就维护和加强和平的根本问题进行对话。与此同时，与会者还表示确信，只要在具有建设性的态度及争取达成积极成果的政治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并充分考虑到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及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

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出发点是，与消除核战争威胁有关的问题，寻求结束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切实可行途径这些事应在目前进行的政治对话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它们并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发展是不可扭转的，因此强调指出，削减欧洲的中程及战术核武器直至最终消除这些武器的问题可以通过举行建设性的谈判来加以解决。

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欧洲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停止在这一大陆上积聚新的核武器。在这一方面，出席会议的国家强调指出应停止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并宣布如果采取了导致撤出现已部署的导弹这样的措施，那么为取消反措施而采取的步骤也就同时生效。这也将为重新恢复谈判以便就从欧洲消除中程及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达成适当的协议奠定了基础。对恢复谈判的那怕是一点可能性和机会也不能放过。

在这一点上，华沙条约缔约国特别呼吁北约成员国进行合作，以便停止部署新

(梅斯特先生，匈牙利)

的中程核导弹、撤出已经部署的导弹并在欧洲实行有效的核裁军措施。

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前就核裁军、禁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并消除化学武器的问题共同或单独提出的所有建议和倡议现在仍然有效。关于本会议的工作，外长会议表示确信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可以达成与国际安全的关系重大的协议，条件是所有与会者坚持不懈和目的专一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根据匈牙利代表团的请求，将由秘书处散发本会议所有正式语文文本的 CD/501号文件。

我右边的邻座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已经对华沙外长会议的工作发表了评论，对此我表示欢迎，我确信如果本会议的成员对这份文件加以研究的话，这将对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的工作产生积极的效果。

最后我要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感谢你坚韧不拔而又随机应变地努力指导本会议的工作朝着开展实际活动的方向发展，感谢你从容自如和不偏不倚地行使了主席的职务。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还要感谢贾帕尔大使、贝拉萨德圭先生及秘书处的全体成员为确保我们工作所必需的条件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及他致主席本人的友好言词。

今天登记发言的人全部发言完毕。还有哪个代表团希望发言？

杜贝大使（印度）：就我所了解，您打算把全体会议转为非正式会议，然后再召开全体会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在那次全体会议上作一次简短发言。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希望现在就发言。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大使。我是打算现在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然后再召开全体会议，到时我将为尊敬的印度大使提供一个发言的机会。

现在我想让全体会议休会，并在5分钟后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便审议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曾提到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斯里兰卡)

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下午5时25分休会，并在下午5时4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继续进行。

我现在把载于第12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提交给本会议，它是关于伊拉克代表提出参加本会议全体会议的一项请求。对这一决定草案有没有反对意见？

锡尔詹尼先生（伊朗）：全世界都谴责伊拉克对军队及平民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而伊拉克政府仍未停止使用这种不人道的武器，对此联合国组织曾表示遗憾，正值这样的时刻提出了伊拉克要求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或作一次发言的问题。

由于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大约两千名军人及平民身受其害。这一点不仅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关，它更涉及到共同的人类良心受到伤害的问题。现代的人类文明社会不能也不应该容忍这种罪行，有些代表团持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并谴责了伊拉克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对这些代表团我们深表谢意和敬佩。伊拉克政府在上周也使用了化学武器，而最近一次使用这类武器的时间则是在本周之初。

伊拉克从未停止使用这类武器，可是它竟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给它参加其工作的机会——就在秘书长派出的使团正在伊朗调查使用这类武器的问题时，伊拉克也未停止使用这类武器。就在那个情况下，它也不肯在使用化学武器上收手。而在这里，我们这个庄严的组织是一个裁军会议，它尊重并信守赋予它的深具人道的职责。这里不是一个伊拉克要去发言的军备会议，鉴于伊拉克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从而使全人类的良心深受伤害，鉴于这一罪行仍未停止，我们反对伊拉克以任何方式参加本会议1984年会议。我们认为本会议不应接受这一请求而使它蒙受耻辱。

哈桑先生（埃及）：在这次会议期间，本会议曾收到了许多非本会议成员提出

(哈桑先生, 埃及)

的参加其全体会议或就各项议程项目作一般性发言的请求。迄今为止, 本会议同意了所有的这些请求, 而且尽管人们有时也感到某些代表团对其中的一些请求持有保留态度, 但是没有哪个代表团反对接受这些请求, 因为本会议承认所有国家的权益以及《最后文件》赋予各国在象裁军这样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根据这一原则并本着这一传统我们曾希望对伊拉克的请求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 允许伊拉克在本会议作一般性发言。但是由于我们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 因此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就意味着拒绝了这一请求。尽管如此, 我们希望非正式协商将继续努力找到一种对今后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我们最近获悉, 伊拉克希望在本会议作一次发言。在1984年4月2日这个国家就曾向我们提出过参加我们工作的要求。可是大家都知道, 由于本会议一个成员国的反对, 在是否同意这项请求的问题上人们不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与前者不同的请求。事实上, 伊拉克以诚意的态度希望就一个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因为有充分理由认为伊拉克代表的发言将与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有关。我们认为本会议成员无一例外都会认为听取伊拉克的观点是有益的, 以便能够形成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看法并确定在这方面的责任。

摩洛哥代表团深表遗憾, 由于一个代表团的態度会议不可能在伊拉克要求参加我们工作的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特别是由于迄今为止本会议从未拒绝过这样希望来此发表讲话的代表。

鉴于有人在此对伊拉克提出了严厉的指责, 因此如能允许伊拉克代表来会议上对我们表达其政府对于有无使用化学武器这个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的观点, 那将是公平合理的。

锡尔詹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我想对尊敬的埃及代表和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作一简短的答复。

关于埃及同事所说, 本会议曾多次接受过这种请求, 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而且应该是这样的。但是, 会议需对这种请求作出决定这一事实本身则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关注, 即会议应能在这些请求中作出抉择。并不是每个国家——如果它本身正在

(锡尔詹尼先生, 伊朗)

违反着本机构准备倡导的原则——都有权利利用这一重要机构的时间来发一通议论。由谁来谈论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我要问我的埃及同事，由谁来谈论本会议面临的重大问题？由公开违背上述原则的国家来谈吗？它在这里想说什么呢？我的摩洛哥同事说，伊拉克代表应当有机会到这里来澄清一下对其提出的指控。我认为，而且我想大家都知道，秘书长派往伊朗调查使用化学武器情况的代表团的报告是十分清楚的了。已经做了充分的澄清。我只是认为，伊拉克代表在这里出席会议这件事只能是对我们这一崇高的机构的侮辱。我们再次重申，只要伊拉克还在使用化学武器——我已说过，本周早些时候伊拉克又对伊朗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伊拉克就不会有机会参加这一崇高的机构。

主席：还有其他尊敬的代表要就此问题发言吗？

看来没有了。鉴于刚才的发言，我只能宣布，当前关于伊拉克代表提出的请求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来处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交给我的信。我想这封信已散发给各代表团。我知道尊敬的墨西哥大使打算作一发言。

现在请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谢谢你，主席先生。我相信本会议所有尊敬的成员和你主席先生一样，都已得到了今井大使以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身份于4月16日致你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此信十分直截了当，其中提到筹备委员会的一个要求，即本会议应为该委员会定于1984年10月1日至1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准备三份信中规定的工作文件。一份是与所谓的核禁试有关的；一份涉及本会议的议程项目5；第三份涉及也属于我们议程上的一个内容，称为消极保证。

主席先生，你还记得这一要求是在筹备委员会中一致通过的，而且需用上述工作文件的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要到10月份，即10月1日至12日才举行，既然如此，我建议本会议各成员国应利用自明天开始的休会时间，就满足筹备委员会要求的最好的办法非正式地交换一下意见，并建议俟6月份复会后在一项正式会议或非正式会议上审查这一问题。

(主席, 斯里兰卡)

主席: 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他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 即把我们就向本会议提出的这一项要求作决定一事延至夏季会议进行。现在请尊敬的巴西代表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我注意到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关于将决定推迟至夏季会议作出的意见。同时, 先生, 我可以谈谈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这一意见既适用于今天的情况, 也适用于下一次再谈及这一问题时的情况。我十分仔细地阅读了今井大使给我们的信件, 我对尊敬的日本同事送来的每一份文件都要仔细阅读的。我本来也希望出现另一种情况: 由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散发一份函件, 说明一下它们在根据那份与核禁试、军备竞赛等有关的条约所做的承诺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关于要求本会议为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准备一份报告一事, 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技术方面的困难: 我不知道我国代表团怎么能够同意参与为我们并非其成员的委员会准备一份文件。为此, 先生, 我想休会期间也许可以用来找到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如在1980年采用的那种办法, 即本会议向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国分发一份会议的《最后报告》。这样做, 我国代表团没有反对意见。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我国代表团当然不反对墨西哥大使的建议, 即推迟就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致我们的信件作出决定。无论如何, 我国代表团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 本会议以外的一个机构在致会议的信件中提出的要求, 如果得到同意的话, 将涉及本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关系方面的原则问题。此外, 如果接受这一要求, 结果就将是准备这种报告的一系列工作, 而这方面的困难我们是很容易想象的。我国代表团认为, 以往采取的做法, 即通过秘书处的适当渠道, 向提出要求的机构转交本会议的有关年度报告, 可能适于解决这种问题。此外, 在这种情况下并考虑到将来的情况, 本会议的报告宜在与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的有关的一些具体方面写得详细些。

哈桑先生 (埃及): 我只讲几句话。关于会议收到的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信中的要求, 我们已听到了不少意见。由于这些意见中含有不同的建议, 因此在会议对此作出决定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并交换意

(哈桑先生，埃及)

见。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墨西哥大使的建议，即推迟至夏季会议期间再对此事做出决定。谢谢。

主席：感谢尊敬的埃及代表。对于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关于延至夏季会议再对我们收到的要求作出决定的建议，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了，看来没有。

就这么决定。

主席：现在请尊敬的印度代表杜贝大使发言。

杜贝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今天请求第二次发言，这次的身份是正在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的21国集团协调员，这次协商的目的是，就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以及一切有关事项”设立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我要谈的内容是，21国集团在为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方面已达到的程度，它们表现出来的谅解，它们所做的妥协以及尽管进行了两个月以上的持续努力，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这一情况等。

我没有必要来强调本会议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第38/183/G号决议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份决议是联合国会员国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没有任何一个会员国反对。该决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就防止核战争的切实措施进行谈判。

因此，在协商过程中，21国集团自然就重申了它关于就此问题设立特设委员会的要求，并将大会决议中载有的职权范围提交其他集团通过。本集团还在春季会议结束前很久就强调了设立特设小组并制订商定的职权范围的紧迫性。同时鉴于21国集团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的立场——如果说不上相同的话——趋于一致这一事实，我们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愿意进行谈判，愿意尽最大努力照顾西方集团的观点。

我们早在协商的最初阶段就不失时机地告诉西方集团，我们意识到它们在初期的发言以及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提交的工作文件中所表达的关注。因此，我们提出修改我们建议的职权范围草案，并且为了在下述重要方面满足西方集团的关注，我们所做的让步超出了对应的程度。

(杜贝先生, 印度)

- (a) 对于特设委员会, 我们准备接受一种不谈判的职权范围, 条件是承认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目标应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映出来。并且, 职权范围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对所有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的提案进行透彻的审议。
- (b) 我们毫不含糊地指出, 我们的意见是所有提案, 包括西方国家提出的提案, 都将得到审议, 而不在其中分出优先次序。
- (c) 我们并且解释说, 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对会议收到的每一份提案的法律方面、政治方面、技术方面以及军事方面所有方面都进行审核; 审核对这一问题的各种态度, 并在此基础上向裁军谈判会议并通过裁军谈判会议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份结构完善的综合报告。

我们表示一旦西方集团向我们表示在原则上同意设立特设委员会, 我们会乐于提出一项供其它集团考虑的职权范围修订文本。等待了整整三到四个星期以后, 西方集团告诉我们, 它们虽然不一定反对设立特设委员会, 它们最后同意与否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就它们都认为满意的一份职权范围达成协议。鉴于这一情况, 我们立即以我们集团的名义向它们以及其它集团提出了一份职权范围修订草案。西方集团对这一职权范围的初步反映总得来说是积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也愿意赞同我们提出的这份职权范围草案。

西方集团的协调员也提出了一份关于特设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这份草案在两个重要方面与 21 国集团提出的草案存在着分歧。首先, 对于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较为长期的目标没有提出任何规定, 其次, 它意味着完全改变这一议程项目的性质本身, 因为它规定要对核时代的和平与安全的条件进行全面的审查。因此, 对于 21 国集团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人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对于防止核战争的关注的中心内容就在于, 采取措施以确保人类在本星球的生存,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安全。21 国集团在本会议和其它讲坛曾多次指出, 生存应该优先于安全。

然而, 我们并没有拒绝以西方集团的名义提出的草案, 而是以一种妥协的精神, 提出了两种供选择的案文。在这两个案文中, 为了照顾到西方国家的立场, 删去了提到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关于铭记进行谈判的目标的内容, 代之而加入的是一段短语: “作为谈判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份案文中, 关于考虑切实可行措施的主要目标也

(杜贝先生，印度)

作了很大的更改，这也是为了照顾到西方集团的观点。在另一份案文中，为了顾及西方国家关于安全的关注，提出“应根据国际社会关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确保人类生存的目标的总背景”审议上述提案。

西方集团把21国集团提出的前一份供选择的案文作为一种基础。它们对主要的职权进行了修改，以便把注意的焦点进一步从切实可行的措施方面转移开，而且除了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职权范围内有所反映外，并没有列入任何关于进行谈判的较为长期的目标的措词。

昨天，21国集团在对西方集团的最近一份草案进行了十分仔细地审议之后，决定在接触小组昨天下午就此问题进行的讨论中采取一种极为灵活和积极的态度，以便能够不迟延地达成协议。不幸，西方集团的协调员在接触小组会议刚开始就告诉21国集团，它们的有些成员国不能接受它们自己的草案。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这份草案是协调员负责提出的，这样提出当然是有待进一步考虑的。

因此，到目前为止颇有希望达成协议的协商终于失败了。当然，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6月份复会后仍将继续努力。我仅在这里向西方集团协调员，尊敬的比利时大使以及其他代表，包括协助比利时大使工作的尊敬的法国大使等，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表现出来的卓越的谅解精神表示深切的感激并致以敬意。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昨天最后一刻的情况把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协商整个打乱了，使它处于一种变化不定的状态。很难预测复会时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时间并不站在我们一边。除非我们能够在会议复会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之内就作出决定，否则从复会到制订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之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一问题从所有角度进行真正彻底的讨论，而这一工作早就应该做了。

同样极为重要的是，复会以后我们进行协商应该以21国集团提出的两份供选择的草案、西方集团对这份草案作出的反映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草案为出发点。如果有人试图倒退到这些草案中所反映的最新观点，我们的努力就绝不会成功。

我谨呼吁西方国家的代表们不要回到它们自己过去的立场上去，这一问题应该在全体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我不想浪费会议的时间，不想来重复说一下，为什么这种态度不能认为是对世界大多数国家以及西方国家自己的大部分公众舆论

(杜贝先生，印度)

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紧迫感的严肃的反映。我还想强调一下，职权范围草案必须以适当的，共同能接受的方式反映这一点：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只应当是通向认清谈判问题并促进谈判的一个步骤。

在将要进行的协商中，21国集团将保持迄今为止一直表现出来的谅解和妥协精神。但否，在到目前为止进行的谈判中为了照顾其它集团的观点，使21国集团的原有立场不断地遭到侵蚀。因此我们的立场不会再“退让”了。除非西方国家表现出了解到我们照顾它们观点的程度并说服它们各自的政府，21国集团已经采取了在当前情况下所能采取的灵活的和合理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达成协议。

我想强调一下，仅仅把关于这一问题的项目在议程上单独列出本身并不表示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形势发生了任何变化。这仍然不能使我们对从各方面提出的下述问题作出答复：在防止核战争方面，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正在做些什么？

今天早晨我感到比较放心的是，听到了尊敬的法国大使说，法国政府主张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发言也支持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代表21国集团提出的各种职权范围草案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有助于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希望职权范围的案文能够尽可能保持概括而广泛，而不要在文本本身中强调我们可能希望给予优先地位的方面或者我们可能主张的办法。因此，我谨再次呼吁，我们应该制订一个一般性的职权范围，在草拟职权范围本身这一方面不要产生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不同的国家集团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对于昨晚那些西方国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是能理解的，我请求西方国家不要产生误会。我谨向他们保证，我们不会利用特设委员会中对这一问题的审议作为反对他们的武器，因此他们也没有理由挥舞他们的威慑手段，把它应用于拟定职权范围草案的阶段。

主席：还有两个人要求发言；在他们发言之前，我想宣布一下，秘书处已向我建议，会议应尽早结束，因为口译人员已工作三小时，感到疲劳了。

现在请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 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谈防止核战争问题, 因为我荣幸地在代表了社会主义各国参加这一问题的协商。

社会主义各国对设立关于议程项目 3, “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特设委员会方面的努力的失败深感遗憾。我们的失望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社会主义各国不仅提出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的工作文件, 即第 CD/484 号文件, 并在第 CD/434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份适当的职权范围草案, 而且还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 以便能就这一项目开始实际的工作。

任何代表团只要密切注意了这些努力, 都必定会承认我们的灵活性。社会主义各国表示愿意谋求一个职权范围草案的妥协方案, 这是因为考虑到我们与 21 国集团成员国的目标和立场在概念上较接近。21 国集团代表所做的发言, 特别是今天印度大使的发言再一次证明, 对于采取切实步骤解决核战争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我借此机会向杜贝大使个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表示敬意。

使得会议无法就“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一项目开始实际工作的全部责任在于拥有核武器的那些西方国家, 它们全然不顾其他国家的意见和立场。我们在这些协商中的经历使我们对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愿望、真诚地进行工作而不试图欺骗其他参加者打一个大问号。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考虑到这种态度并得出适当的结论。协商的结果把就这一问题开始实际工作一事比以前更往后推了。我们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机会, 谁也没法说以后什么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机会。

关于议程项目 3 的情况证实了一个结论, 即消除核战争威胁方面的努力正受到那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及其最亲密的盟国的军国主义政策的阻碍。不应允许这种危险的局势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各国准备为就议程项目 3 开始真正的实际工作继续加倍地努力工作, 并将一如既往地为一项适当的职权范围而工作。

普罗科菲耶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苏联代表团拟对于澳大利亚代表刚才的发言行使一下答辩权。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联)

苏联代表团注意到澳大利亚代表团对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 V. I. 列宁先生的理论遗产的注意。

我要向澳大利亚代表指出，不提到讲话的具体历史场合而试图以任何方式断章取义地援引原文是不可能做好的。对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从伟大的列宁所著的题为《关于裁军口号》文章中摘引“裁军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的语录对于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就象对其他国际讲坛的工作一样，仍然是适用的，我强调这一事实。

我们参加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的全部历史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我们不需要任何方面来教训我们应如何进行谈判。我们赞成进行谈判，但这种谈判应是诚恳的、建设性的、务实的以及认真的。苏联在限制军备和实现裁军的问题上提出的大量重要倡议和提案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倡议和提案始终贯彻了苏联的列宁主义裁军思想。我们的提案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支持，并没得到普遍的响应，因为这些提案考虑到我们时代的首要问题——消除核战争威胁；因为它们不仅对制止军备竞赛，而且对削减军备作出了真正的贡献；这些提案是从双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出发的，是以属于不同军事、政治联盟的国家的诚意与合作为先决条件的。这些提案考虑到其他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有助于改善相互了解和总的国际气氛。

主席：还有两位代表要求发言。我要宣布一下，我得到一个建议，除非我们在 10 分钟内结束会议，否则不得不在明天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以便继续进行工作。

考虑到这一点，现在请尊敬的比利时大使发言。

德帕斯大使（比利时）：我只简单地谈两句，因为对印度大使对我们所作的发言，我不打算笼统地发表意见。我认为他对有关防止核战争特设小组职权范围的讨论所作的按时间顺序的介绍十分准确，正因为的确如此，所以，虽然我并非完全同意他的每一个观点，但是我认为，由于他所表现的精神，在每个细节的问题上吹毛求疵是没有意义的。这件事的主要因素是 21 国集团表现出来的意愿，即应考虑到西方国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我认为，21 国集团和我们是不会有意见分歧的。

(德帕斯大使, 比利时)

我现在的发言是十分坦率的, 我认为我们一无所失, 因为在关于防止核战争工作的职权范围的研究上临时发生的变化造成了在我看来是一时的挫折, 而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时间。我们不得不在无法自由地向各自政府说明这一讨论发展过程的情况下采取某些立场。这一讨论涉及到西方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这个方面我们必须举行级别很高的协商, 可是这类协商并不那么容易办到。各代表团同其首都之间的往返联系并不总是象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我仍然认为, 虽然西方国家十分赞赏21国集团表现出来的虚心的精神, 但21国集团通过其代表杜贝大使的努力毫无疑问已在自己这方面促成了下述事实: 过去反对设立关于这一议题的委员会或工作小组的西方国家, 现在终于已表示同意, 并且坚决要在职权范围问题的探索上取得成功, 为此我要赞扬杜贝大使表现出来的耐心、坚韧不拔的精神及通情达理的风格。这一工作将继续下去, 因而在这样一个时候如果象保加利亚大使那样对问题火上加油, 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并且提出指责, 这是完全不恰当的。在这个场合这么做肯定不合适。我断然拒绝这种指责, 而且也高兴地看到杜贝大使未采取这种行动。我确信, 如果我们都按照自己决心的, 以耐心和灵活的态度来进行工作, 那么使这项职权范围将能获得一致通过是大有希望的。

比斯利先生 (加拿大): 主席先生, 我的发言很短, 而且我也希望不会引起争议。我只是想说, 虽然时间很晚了, 我想谈一点意见——我希望这一点意见不会被认为太过激——我们加拿大代表团甚至是加拿大政府本身认为,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 各国的安全概念和人类生存的概念并不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概念。我们从这种思维过程中看不出有什么逻辑, 我希望下次开会时能再来谈这一点。现在, 这些说法对某些人或某些代表团来说已成了带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讨厌的言词了, 但对我们来说并不如此。现在还需要说——也许仅仅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说——根据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所说的, 关于21国集团的诚意及克制态度我们再多说就有些太自以为是了。另外我还要讲一点, 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我们才不认为安全是可以单方面获得的, 我们经常阐述相互的安全的概念。我不管别人是否喜欢换一个说法, 如“共同安全”等, 但我想我应当能使用“安全”一词而不使它变为一个贬词。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我想谈的另一点，也是加拿大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1983年4月谈过的一点，即这个多边讲坛确实不能再卷入外部的其他谈判了，如不扩散条约方面的谈判等。我国认为这个条约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很容易看出如果没有这一条约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局面；我想大家都会争相取得核武器吧；我还想到正在这里进行的双边谈判。然而，尽管我们既没有卷入中程核力量谈判，也没有涉足裁减战略军备谈判，我们仍要强调，即用我国副总理的话说：“这些谈判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因此，无论我们是来自欧洲或北美还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这两个谈判对我们都有十分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我只想在结束时极为诚恳地呼吁，这些我们认为与防止核战争的问题直接有关的谈判能够恢复。

主席：感谢尊敬的加拿大大使的发言。现在我想来谈一下秘书处今天散发的关于年会第二期会议第一个星期，即自6月12日至15日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是经与会议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协商拟定的。象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只是参考性的，必要时可作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此次会议是四月份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斯里兰卡代表团有幸在本月份担任了会议主席。我不打算来总结一下会议4月份或第一阶段的工作。今天，许多发言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做了总结。我们全体会议的工作计划安排得很满，许多杰出的人士到会发了言，这加强了本机构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的重要性。由厄克于斯大使任主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已继续进行了工作，我还感到高兴的是，本月份我们还设立了由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维沃达任主席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我要感谢所有代表团向我提供了慷慨的合作；我要为我的两位前任，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和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的耐心和才干向他们致敬。对于秘书处，特别是对我们的秘书长贾帕尔大使和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我要为他们殷勤的协助表

(主席, 斯里兰卡)

示深切的感谢。我还要感谢译员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合作。

最后, 我向瑞典大使表示祝贺, 欢迎他在我们休会后复会时担任六月份会议主席。我真诚、良好地祝愿他在任职期间工作顺利, 并保证我国代表团支持他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30举行。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6:45结束。

×× ×× ×× ×× ××